



必須結束一黨專政，實現民主中國！
維園晚會悼念六四屠城 29 周年
反對強力壓迫抗爭的青年並判重刑
捍衛採訪新聞自由，保護記者人身安全
中國官僚買辦階級催生金融恐慌
土耳其埃爾多安和他的對手
熊安東口述生命史

十月評論

October Review

第45卷第1期 (總第244期)

2018年6月30日出版

香港 3	維園晚會悼念六四屠城29周.....	振言
4	大會程序、悼辭、大會宣言(轉載).....	支聯會
6	六四血腥仍在豈應獨善其身(轉載).....	長毛
8	反對強力壓迫抗爭的青年並判重刑.....	軍行
9	捍衛採訪新聞自由，保護記者人身安全.....	涓滴
中國 10	必須結束一黨專政，實現民主中國.....	張開
11	中國官僚買辦階級催生金融恐慌.....	破謎
12	習近平的雄安新區規劃和海南自由貿易港.....	劉山青
國際 17	改革Wells Fargo富國銀行高管報酬的提案命(來論).....	趙京
18	土耳其埃爾多安和他的對手.....	伊斯卡拉、科瑟俐落格魯、茲爾伽斯特
27	黃金時代的終結：訪談米利安·朗和厄德伽多·蘭德爾.....	郭第薛得
回憶 38	憶王芳（轉載）.....	劉正清
41	悼念熊安東老戰士.....	十月評論同人
42	熊安東口述生命史…… (轉載)	段躍
英譯 55	We Must End One-Party Dictatorship to Achieve Democratic China.....	Zhang Kai

維園晚會悼念六四屠城29周年

振言

悼念六四屠城29周年的維園燭光晚會，在一片反對聲中舉行過了。出席人士坐滿了六個足球場和草地，大會宣佈有11.5萬人參加，比去年多5,000人。

支聯會預定了18項大會程序，內容豐富，包羅甚廣，其中參加者多次高喊「結束一黨專政」，尤受注目。(詳見附錄的「大會程序」「悼辭」、「大會宣言」和長毛寫的「六四血腥仍在 豈應獨善其身？」)

反對出席的人士唯一的「理由」是支聯會主持的六四晚會只是「行禮如儀」。這是完全抹煞上述的事實的。

許多民運的歌曲，不斷響遍了維園。晚會的燭光照亮了維園，也照亮了大眾的良知。出席維園晚會的人數眾多，世界許多地方都有熱心人士悼念六四，這些對天安門母親是一種慰藉和鼓勵，她們向國家主席習近平發出公開信宣稱：

「我們的中國夢就是六四慘案得以昭雪，正義得以伸張」。她們的成員狄孟奇透過短片，向維園晚會控訴六四屠城是國家犯罪行為。流亡海外的六四民運參與者吳仁華，也透過短片表示：每年維園燭光悼念晚會就是記憶與遺忘的抗爭，也是中國給繼續抗爭強權的民眾提供了一種信心和鼓舞。

這次晚會得到出席人士的熱心支助，共籌得148萬元，比上年多7萬元，香港眾志籌得33萬

元；比上年大增15萬元，社民連也籌得32.2萬元，比上年大增13萬元，等等。

另一邊廂，拒絕出席支聯會六四燭光晚會的學聯，當晚也在場外開檔為「抗爭者支援基金」籌款，只籌到8000多元，與上述支聯會等籌到的巨款相差很遠。

今年是六四事件29周年，多間大專院校學生會連續第3年缺席支聯會的燭光集會。支聯會常委、六四紀念館管理委員會主席麥海華昨在港台《香港家書》批評，去年杯葛集會的學生組織今年不再辦論壇，「說明了在六四這大是大非的議題上立論模糊是難以繼續」，他又質問自認勇武的人「難道屠城的政權不應被追究嗎？」他表示，「搞散」六四悼念集會最高興的是中共。

儘管如此，今年的維園晚會仍見有許多青少年參加，表明薪火相傳並非虛言。

06/06/2018

十月評論
October Review

第45卷第1期（總第244期）

2018年6月30日出版

出版/編輯/承印：《十月評論》編輯委員會

通訊處：香港郵政總局信箱10144 號

Address: GPO Box 10144, Hong Kong

E-mail: octoberreview@gmail.com

Website: <http://www.october-review.org>

〔本刊一切具名文章，不一定代表編輯部立場〕

六四 29周年燭光悼念集會大會程序、悼辭、大會宣言(轉載) 支聯會

【大會程序】

- 〈1〉播放錄像「六四」二十九周年：六四解碼
- 〈2〉獻花 / 支聯會常委
- 〈3〉燃點火炬 / 支聯會常委 / 年青人
- 〈4〉致悼辭 / 支聯會主席何俊仁
- 〈5〉默哀一分鐘 / 全體會眾
- 〈6〉播放「天安門母親」群體成員錄像講話 / 「六四」遇難者王鴻啟母親狄孟奇
- 〈7〉齊唱《血染的風采》 / 全體會眾
- 〈8〉播放「六四」屠殺見證者錄像講話 / 吳仁華
- 〈9〉齊唱《自由花》 / 全體會眾
- 〈10〉與青年對談 / 左翼21成員謝浚賢、浸大社關黃雅文（ 陳健民主持）
- 〈11〉獻唱《自由之歌》 / Boyz Reborn
- 〈12〉播放「七零九」律師大抓捕家屬錄像講話 / 李文足
- 〈13〉播放《大海》音樂錄像
- 〈14〉齊唱《民主會戰勝歸來》 / 全體會眾
- 〈15〉誦讀《大會宣言》 / 支聯會副主席鄒幸彤
- 〈16〉火化弔唁冊 / 支聯會常委
- 〈17〉呼籲參觀「六四紀念館」專題展及支持擴館，加入「支青組」及義工組 / 蔡耀昌、李卓人
- 〈18〉喊口號、齊唱《為自由》

【悼辭】

那年夜裏，你們在北京天安門廣場和長安大街上被殺害；此後每年的那夜，我們在香港維多利亞公園悼念你們，堅持守護著一片璀璨燭海。

二十九年前的六月，年輕無悔的學生獻上瑰麗青春，樸實無懼的市民流出熱灼鮮血，譜寫民主中國未來的願景，卻被強權政府鎮壓槍殺；二十九年後的今天，木樨地的坦克履帶坑痕雖然已被填平，人民紀念碑石階的裂縫被修補，貪腐瀆職和打壓逼迫的勾當被盛世粉飾的假象遮掩，

但是，當年槍火的烙印、硝煙的薰炙、血泊的憶記和人民的悲憤，依然歷歷在目，縈縈於懷。

我們牢牢緊記，歷史傷口沒有癒合，鮮血未凝結，傷痛未撫平，沉冤未昭雪，公義未伸張。我們當然曉得，威權統治者要磨滅人民的記憶，獨裁掌權人要篡改歷史，屠殺人民的劊子手要拭抹斑斑的血漬；我們完全明白，不能汲取歷史教訓的政府是沒有希望的政府，沒有撥亂反正省悟的國家是沉淪的國家；但是更重要的是我們深信，殘暴不仁的政權必然覆亡，絕不會千秋永績！

歷史的長河從來就是波濤洶湧，民主的路途從來就是崎嶇顛簸。我們必須承認，當前的政情時局十分惡劣，白色恐怖的陰霾籠罩大地，黨國不分的當權者一直在折磨、刑訊和禁錮「六四」難屬、維權和政治異見人士，但是，人民的強韌意志依然百折不撓，抗爭行動從未止息，正是民心所繫，希望所在。

今夜追悼你們不只是參與一次儀式，或者懷緬一種情懷，更是嚴正重申，我們必須傳承你們未竟心志的許諾、堅執和承擔；今夜我們護佑著手上的一點燭光，不只是燃亮人們的良知，更是照耀八九民運這段血染歷史冊頁的真相！

石在，火種不熄！你們的英靈不滅 遙祭祝願你們安息！

【大會宣言】

近幾年，香港的紅線愈來愈多，地雷處處。最新的紅線，叫「結束一黨專政」。

「結束一黨專政」說的是甚麼？
不就是要求政黨輪替，
將權力還給人民，
真正的民主。

民主，這個卑微又根本的要求，
二十九年前的北京天安門廣場，
激起席捲全國的抗爭，
卻在一黨專政下被血腥鎮壓。

這個訴求，十年前出現在《零八憲章》中。
民主、憲政、共和的訴求，吸引逾萬人聯署。
但是在一黨專政下，發起人劉曉波被重判十一年，
終在羈押下逝世，連骨灰也未能留下。

這個訴求，四年前在黃色雨傘下盛放，
國內不少人走上街頭支持香港，
但在一黨專政下，不僅真普選無影無蹤，連只是
支持香港的國內朋友，現仍身繫牢籠。

一黨專政一日存在，
類似的悲劇會不斷重演，
要悼念的人會愈來愈多；

一黨專政一日存在，
中國不會有真正的民主，
香港也不會有真正的自由。

要結束這個循環，
必須結束一黨專政。

但他們要讓結束一黨專政成為不能逾越的線；
他們要我們接受這現實：中國就是共產黨的天下，
共產政權就是要千秋萬代。

我們要清楚的告訴他們：
我們絕不接受！

我們無法給大家路線圖，
只要按部就班就能結束專政，
但我們知道，令專政長存的，
是個人的沉默、服從、妥協。

因此要結束一黨專政，
最起碼敢於站出來說，
我們要結束一黨專政。

在內地，不少人為了說這句話身陷囹圄，
在香港，我們又是否準備好，為這句話付出代價？

不論想與不想，活在這個新時代：
講真話會有代價，
追求公義會被懲罰，
不准說皇帝沒有穿衣服的時代。

不是每個人都是革命家，
但每個人都可以做一個「人」，
忠於良心、忠於事實，
拒絕生活在恐懼之中。

今日大家敢於來到這裏，
舉起燭光，
記住那些被一黨專政壓制的人——
感謝大家的勇氣。

毋庸妄自菲薄，
每個敢於說不，敢於堅持，敢於不服從的人，
都在示範給世人看：
專政不是不能抗拒，
反抗也並非不可能。

最終的雪崩，力量來自每一片雪花。

支聯會五大綱領，不只是口號，
更是一個承諾。

對二十九年前的死難者的承諾；
對為民主奉獻一生的劉曉波的承諾；
對曾為中國、為香港民主付出過、犧牲過的人的承諾——
你們未竟之志，我們當繼續承擔。

**釋放民運人士！平反八九民運！追究屠城責任！
結束一黨專政！建設民主中國！
悼六四！抗威權！**

六四血腥仍在 豈應獨善其身？(轉載)

長毛

2018.5.29



5月下旬，德國總理默克爾訪華，想慰問劉曉波遺孀劉霞，但後者卻不知所終，應該一如其他維權人士，在敏感時刻「被失蹤」了。

民主英靈、豈敢遺忘

其實，自劉曉波去年7月因文字獄坐牢「被失救」而逝世後，劉霞並未因「死者已矣」而獲自由，遭中共政權軟禁至今已近8年！家破人亡，與其說由於劉曉波被判入獄11年，並在2010年獲頒諾貝爾和平獎而觸怒當局，毋寧講始於六四血腥鎮壓。1989年4月劉曉波於美國留學，痛感愛國民主運動蠱起而回國，更於6月2日聯同其他三位知識分子，冒險到天安門廣場絕食，倡議留守抗爭的學生撤退，以免於血腥屠城之劫而不果。此後28年的餘生，就與軟禁、牢獄結下不解之緣，去年病死獄中，不過是六四血腥的延續。

又如六年前，已繫獄逾廿載，被折磨致殘的李旺陽，祇因接受香港傳媒訪問，矢言為平反六四及結束一黨專政之初衷不改，竟於事後「被自殺」的一幕，我等思之，不由不淚盈於眶，怒火滿腔！

丁子霖副教授29年來，一直為其遭軍人槍殺之幼子鳴冤，與其他六四死難家屬組成「天安門母親運動」，要求當局公布真相，追究鎮壓責任，其夫蔣培坤等不及公道來臨，含恨而終。這位白髮蒼蒼的勇者，就如眾多天安門母親一樣，不僅為一己之苦痛而堅持，更是為公義而奮鬥！紀念六四死難者，其實就是痛斥屠夫政權，拒絕沉默，也就是將專制殺人永誌史冊，讓生者免於一黨專政肆虐於永遠，一個政權若可在首都派遣軍隊屠殺人民而逍遙法外，則尚有何事不可為？

中共專政的本質

此所以，六四血腥稍歇，白色恐怖變本加厲，29年來，偌大中國，變成了囚禁異見人士、維權民眾以致維權律師的監獄。

政治不過是經濟的集中表現，正如1989年中共乃是維持其特權於既倒，而不惜公然血腥鎮壓民主運動。今日鷹犬四出，逼迫異見，亦不過是永保其私利於萬世。所不同者，乃是當時尚未蛻變為官僚資產階級，政權祇是攫取特殊待遇，按黨內等級坐地分肥的國家機器。一旦實行以「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為遮羞布的國家資本主義，則各級黨官亦論資排輩，瓜分勞苦大眾創造的財富化為資本，搖身一變蛻化為國企、民企的大腕，各自搾取超級利潤！君不見習近平奢談打貪反腐，雷厲風行數年，何嘗有太子黨的紅二代落網？對異見者趕盡殺絕，變本加厲，適足以說明這些特權集團的貪婪，與其殘酷不仁相輔相成！

紅色資本、操控香港

其實，香港和大陸的關係亦作如是觀。1997年中共政權收回主權，意味著香港民眾已在其斧鉞之下。祇因當時其財力仍未豐碩，要依賴香港作為套取外匯的金雞，不敢貿然殺雞取卵，對紀念六四活動，乃致港人爭取普選運動，尚會稍加容忍；兼且其資本南來亦未如決堤之勢，對於群眾爭取社會改革抗爭，亦因未觸動其根本利益而張牙舞爪。

然而，2008年金融海嘯席捲全球，中共政權藉量化寬鬆惡浪，大印鈔票四出漁利，成為財大氣粗的新貴，受其控制的香港，自然變作資本輸出的樂土，由此，亦以「十二五」、「十三五」為藍本通過各種各式的規劃，布置大白象工程以促進所謂融合，實質助長大陸財團挾持特區政府，享受各種優惠特權，後來居上，儼然君臨香港，又豈能不視爭取平權的普選運動為讎寇，將社會改革之群眾抗爭誣為動亂？

祇要看看恒生指數成分股的變化，大陸財團所佔的比重早已超越本地企業，而在炒賣地產、地皮的狂瀾中，紅色資本則更是翻雲覆雨，一擲千金，其投資的幅度，規模亦隨著人民幣逐漸通用，以及大陸美元儲備銳減而流港，可謂無孔不入，剝削成癖，不斷滲透各行各業！

顯而易見，大量游資湧入香港形成財富效應，祇會惠及能夠參與逐利的小圈子；但通貨膨脹所帶動的物價飆升，卻會令被拒諸圈外的市民變成砧上魚肉，香港近10年的財富幾乎翻了一番，但貧窮人口卻拾級而上，貧富懸殊與樓價、租金均列世界之最，說明了大陸資本竭澤而漁，使特區政府更明目張膽踐踏民意，壓逼異己，以及利用公帑、公共政策酬庸北方主子，讓他們不竭

「尋租」牟利！今年財政預算案寧願斥資416億還富於富，卻連派幾粒像樣的糖以息民怨亦不屑為之，說明林鄭政府既是由中共欽點，則祇能行刮貧濟富之道，挹注於大陸為重的施政，而兩傘運動以來DQ議員、重判示威者、訂立國歌法、強行一地兩檢，以致公然為重開《基本法》第23條立法叫囂，又焉非扼殺群眾運動再起於未然之勾當？

一黨專政之下，豈有完卵！

以為香港可以獨善其身，自囿於中國民眾抗爭之外，顯然是不切實際的幻想，香港威權政治愈益猖狂，打壓異己，又何嘗不是中共與本土附庸結黨營私的必然結果？雙手沾滿血污的屠夫政權作惡，又豈會以深圳河為界？無論大陸民眾和香港市民，都受一黨專政的盤剝殘害，中共官方所謂「中港一體化」，「一國為主」說之不輟，不啻畫龍點睛，圖窮匕現，彰顯兩地民眾命運與共的現實，彼此之反抗日益唇齒相依，攜手並肩，已是不由之路！

「民主是我們共同的理想」，1989年絕食學生以此向訪華的戈爾巴喬夫公開致意。這個理想終將變成事業，蠶起於香港和大陸，但願明年六四30周年，這事業的曙光將普照大地！



反對強力壓迫抗爭的青年並判重刑 軍行

2016年農曆新年，旺角亞皆老街等地引起警民衝突，並爆發騷亂。

當局在最近秋後算賬，大批起訴當日的示威騷動人士，重判許多被捕青年。其中有如楊家倫、莫嘉濤、鍾志華、何錦森、霍廷昊、鄧敬宗、陳和祥、林永旺、李卓軒、麥子晞、羅浩彥、許嘉琪、連潤發、薛達榮、鄧浩賢、吳挺愷、楊子軒、葉梓豐等人，都被控暴動罪，但他們不認罪，仍分別被判囚3年多或4年多，李卓軒判囚2年9個月，鄧浩賢和吳挺愷認罪，判囚2年多，楊子軒和葉梓豐則判入教導所。(引自6月12日《明報》)

對於本土民主前線發言人梁天琦被判囚6年，盧建民判囚7年，刑期太長，為本港開埠以來最重的暴動判罪，社會有識人士和法律界都認為過重。這些都顯示當局是在盡力打壓年青人的行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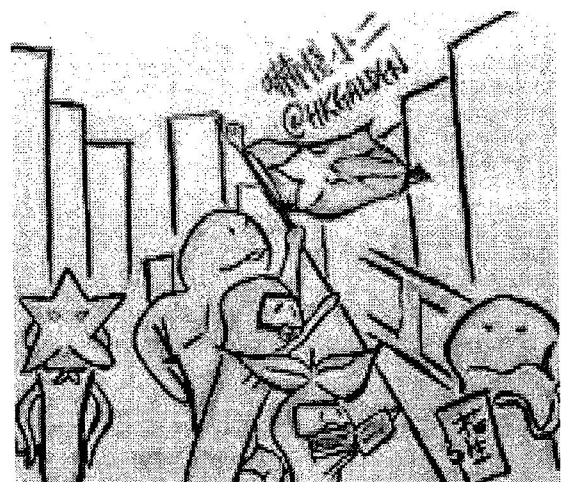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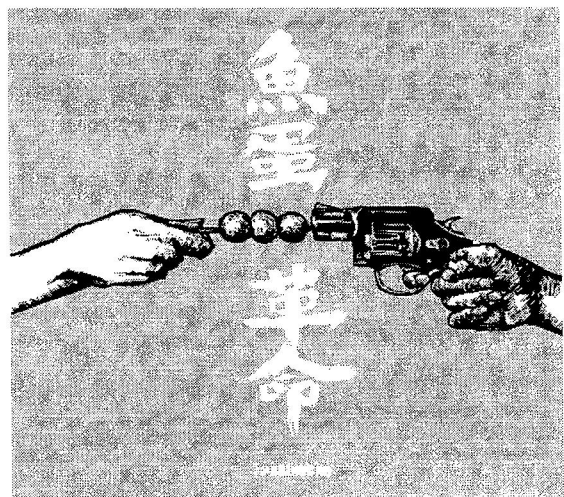
香港8間大專院校的學生會代表，於本月12日聯合發出「告全港市民書」，指大專學界就2016年旺角大規模警民衝突中「抗爭者」的遭遇表示痛心，譴責政府「以暴動罪起訴抗爭者，清算異己」，又指《公安條例》無清晰界定暴動罪中的「破壞社會安寧」、「非法集會」和「暴動」定義，促請當局檢討法例。

周庭在出席由教協、教育大學及通識教育教師聯會合辦的通識教育研討會時，對梁天琦的刑期形容為「不合比例地過重」，又指政府近

年對想參政的年輕人「趕盡殺絕」，雖然不時強調重視青年，卻壓迫想改革社會或在街頭表達訴求的青年，「我都想代表被DQ（褫奪議席）的議員、代表年輕人聲音入議會，但我連參選的機會都沒有」。

在社會人士的關懷與鼓勵下，相信被服刑的抗爭戰士將會迎難而上，克服一切艱苦折磨，鍛練成堅強不屈的革命戰士的。

20/06/2018



捍衛採訪新聞自由，保護記者人身安全！

涓滴

據《明報》、《蘋果日報》等港報報道，本月12日有線新聞記者於四川採訪汶川地震10周年活動時，遭兩名疑為當地村官毆打受傷，其後兩人被安排向記者道歉。

事隔4日，本月16日，now新聞記者於北京採訪北京律師協會聽証會時，遭公安阻撓，攝影師被按在地，強行鎖上手銬和暴力押上警車，額頭受傷流血，被扣留4小時後獲釋送院醫治。

這顯示香港新聞工作者在和平採訪時，無辜遭當地村官和公安粗暴打壓，他們無法無天，任意妄為，導致新聞工作者的採訪權益及人身安全自由毫無保障，港媒和內地媒體都同樣對待。

特首林鄭月娥對港記者遭武力對待表示遺憾，但沒有予以譴責。港區全國人大代表葉國謙認為，特區政府於事件上的回應合適，又稱now新聞攝影師遭公安扣留，過程或涉「阻差辦公」。這顯示他多少是為內地公安強調辯護。

中共中央已明令管控全國的出版物，而且，內地報章大都已變成黨報，專為宣傳黨的意見，許多港報則盡量報道事實，具體顯示兩制的不同，但最近在內地，兩制特色已逐漸被淡化。前述兩地官員的粗暴對待，多少反映出這種變化。

十月評論 2018 第1期

事件發生後，香港記者協會和外國攝影記者協會等團體都同聲譴責中國這種粗暴行為。特首林鄭月娥初時只表示遺憾而沒有譴責。

香港記者面對中國的採訪環境惡化，政治風險和人身安全惡化，還要面對「依法採訪」的再教育；而且，據本月25日《蘋果日報》李平的《蘋論》引証：「今年1月，駐華外國記者協會(FCCC)發佈年度報告指，近半受訪會員表示採訪時遭到毆打，拘留，有五家傳媒的記者申請簽證時受到刁難。」

因此，記協需要制訂記者北上採訪的指引，要預防記者可能遇襲的辦法(如停訪等)，以保障人身的安全；同時，要向國際組織申訴，請求聲援等等，以應對新的情勢。

31/05/2018



必須結束一黨專政，實現民主中國！

張開



新任全國人大常委譚耀宗日前提出，「結束一黨專政」的口號，可能違反中國憲法，甚至影響該人參選立法會的資格。譚耀宗說，這只是他個人的分析，並非中央官員的意見。

另一方面，同為人大常委，被傳將出任基本法委員會主任的澳門中聯辦副主任陳斯喜亦有同樣論調，他說主張「結束一黨專政」的人是違憲，不可擔任立法會議員，強調「憲法是國家根本法，在全國範圍內實施的，香港雖然是特別行政區，但是要尊重憲法，維護憲法權威，沒有兩制之分。」

4月25日，港澳辦前主任王光亞回應稱：「應該不可以參選」，指違反國家《憲法》是違法行為。

但實際上，真正違法的，正是中國的統治者們，他們長期實行一黨專政的官僚獨裁，掌握全國的黨政軍等大權，剝奪人民依照

《憲法》規定的人民應有民主權利，「聯合政府」內的其他黨派也變成了橡皮圖章，連監督干預的作用也沒有。中共排拒了社會主義和計劃經濟，改行資本主義市場經濟，導致大小官員無官不貪，腐敗無能。

像這樣錯誤百出、禍國殃民的中共一黨專政官僚獨裁，怎能不應立即結束，改由全國人民民主選出的政府來統治呢？

人民的眼睛是雪亮的。他們早在八九民運、六四屠城時就已提出這一主張了，香港的支聯會五大綱領中，就有「結束一黨專政，實現民主中國」這項主張，中國人民（包括港澳台人民）都應享有一切民主權利，包括言論、批評、選舉權和被選權，決不能因為有些議員主張「結束一黨專政」便取消他們已被選為立法會議員的職責。他們提出的意見和主張，只能在立法會會議中由多數表決通過或否決，甚至其議員職位也只能經在席三分之二多數議員通過而被取消，決不能由某些人因一些問題意見不同便取消他們參選或擔任立法會議員的職位，有如陳斯喜和王光亞們所主張那樣。

支聯會負責人並不會向王光亞們屈服，他們在今年六月四日晚的維園燭光晚會上，仍會高呼「結束一黨專政，建設民主中國」，一如已往那樣紀念民運戰士的。相信大家屆時都會照每年一樣，踴躍參加燭光晚會，用實際行動回答王光亞們的！

28/05/2018

中國官僚買辦資產階級催生金融恐慌 破謎

2018年6月25日，作為中國首批25家國家高端智庫之一，國家金融與發展實驗室公開發表李揚、尹中立、李拉亞和殷劍峰共同撰寫的報告《警惕中國出現金融恐慌》，不久即被刪除，據說原因乃只供內部討論。

該報告指出三大要點：

(1) 2018年以來，債券違約、流動性緊張、匯率下行和股市下瀉等相繼發生，且有愈演愈烈之勢，加之美聯儲加息以及中美貿易衝突呈長期化和高度不確定性，目前中國極有可能出現金融恐慌。

(2) 金融恐慌是一種極端的集體規避風險的行為。恐慌之發生，並非市場上當真出現了大規模的金融風險並日臻惡化，而是廣大市場參與者對未來市場前景感到茫然甚至恐懼。廣大市場參與者不約而同地抽逃資金而求自保，將會引致或者惡化金融危機。

(3) 應對金融恐慌應有大動作，並明確向世人宣示。主要措施包括，第一，立即啟動國務院金融與發展委員會中的應急處置機制；第二，制定預案，及時、果斷處理違約、破產事件；第三，儘快隔絕我國貨幣供給機制與美元、匯率和外匯儲備的關係，為防範不可避免的外部衝擊做好準備。

針對第三點，報告呼籲大規模隔絕美元、匯率與美國貨幣政策：“鑒於中美貿易爭端可能向金融領域蔓延，應盡可能、儘早採取措施，隔絕美元及美國貨幣政策可能對中國產生的衝擊，這種措施，就是儘快改革我國外匯儲備管理體制，切斷它與國內貨幣供給的關係。”

報告進一步分析：“中國外匯儲備由貨幣當局（中央銀行）管理，這種制度安排使得中國的貨幣政策在事實上被外匯儲備綁架。在2014年前的20餘年中，這種制度形成了“儲備增長→

貨幣供給擴張→央行對沖→法定準備金率提高→可貸資金短缺→利率水準攀升”的連鎖反應。2014年以來，當儲備增長速度下降，一個相反的困局又擺在我們面前。最後，報告一針見血地總結：“必須從根本上擺脫貨幣政策被外匯儲備動態綁架的困局。考慮到中美貿易衝突勢將向金融領域蔓延的前景，我們更需立即採取措施，大規模隔絕美元、匯率、美國貨幣政策對中國國內政策的影響。”

正當國家金融與發展實驗室大聲呼叫：趕緊關上金融防火門！中國的官僚買辦資產階級卻修改法律，堂而皇之大舉引入跨國資本。

2018年6月28日，國家發展和改革委員會公佈《外商投資准入特別管理措施（負面清單）（2018年版）》修訂說明，大幅度放寬市場准入，清單長度由63條減至48條，共在22個領域推出開放措施。

該修訂明擺引入外國金融豺狼，以控制中國最賺錢的金融產業：銀行、證券、期貨及壽險：

- 第17條，取消對中資銀行的外資單一持股不超過20%，合計持股不超過25%的持股比例限制。
- 第18條，2018年將證券公司、證券投資基金管理公司由中方控股改為外資股比不超過51%。2021年取消外資股比限制。
- 第19條，2018年將期貨公司由中方控股改為外資股比不超過51%。2021年取消外資股比限制。
- 第20條，2018年將壽險公司外資股比由50%放寬至51%。2021年取消外資股比限制。

官僚買辦資產階級不僅催生金融恐慌，火上加油，更要趁火打劫，勾結外資洗劫國民財富。

習近平的雄安新區規劃和海南自由貿易港

劉山青

習近平皇朝有點像日本的明治維新時期，德川幕府晚期面臨前所未有的體制危機，及接觸到洋人的船堅炮利後，在國內進行大幅改革，種下後來的軍事擴張和向外侵略，建立大東亞共榮圈。中共文人現在也大談大中華圈。

在習近平皇朝，國務院的角色十分重要。它制訂了大量法規，十分進取。因為，作為第二大經濟體，毛澤東的無法無天管治手法，單在金融領域已經不行；鄧小平設計的集團式官僚管治也出現了羅馬共和國末期的情況，元老院軟弱無力。這是凱撒集權和後來被眾元老反叛的原因。

習近平的中國夢構想超越出富強，因為它已經是第二大經濟強國，有比需要的更多的財力改善國民生活質素，問題只是他沒有真正投放資源，而是準備更大的國際衝突。具體而言，就是雪國恥，統一台灣，收復南海主權。為此，所有現實的政治家，如成吉思汗，首先是安內。

因此，其文集中討論國務院的兩份文件，《河北雄安新區規劃綱要》和《中共中央國務院關於支持海南全面深化改革開放的指導意見》，當中會涉及《中共中央關於深化黨和國家機構改革的決定》和《深化黨和國家機構改革方案》。當然，這一切都來源於2017-10-27的《習近平：決勝全面建成小康社會 奪取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勝利——在中國共產黨第十九次全國代表大會上的報告》。

從解決北京的非首都功能和建立全球最大面積的自由貿易港來說，它的做法是合理的；從堅持專制的《中共中央關於深化黨和國家機構改革的決定》和《深化黨和國家機構改革方案》來發展經濟來說，這點是錯的。

香港的經驗可能給中共官僚一個反面經驗，認為在開放經濟的同時，民主是多餘的。這種中國秩序輸出，令歐盟擔心。習近平的大計被最近的中美貿易戰、中興芯片事件打亂。

雄安新區規劃

2018年4月20日，中共中央、國務院對《河北雄安新區規劃綱要》的批覆向社會公佈，京津冀協同發展領導小組辦公室見了記者。

辦公室表示：“推進京津冀協同發展是重大的歷史性戰略選擇，是千年大計、國家大事。它將會是一個“國際標準、綠色發展、優美生態環境、高端產業、優質公共服務、高效交通網、全方位對外開放的現代化城市。其藍綠空間占比為70%，遠景開發強度為30%。新區森林覆蓋率為40%，起步區綠化覆蓋率為50%，起步區綠色交通出行比例為90%。”

新區發展預計到2035年，17年後完成，主要是承接北京非首都功能，間接解決了遷都的長期壓力。它的編制只用了兩年，完全不符合現代的城市規劃要求。香港填3個地方的2030+也需要10多年規劃。中共的重大工程如三峽，全是長官意志。

李克強表示，他們從國內外279家規劃機構中優選12家團隊設計，諮詢了60多位院士和300多位專家，開展22個專項規劃編制和32個專題研究，也徵求了北京市、天津市、中央和國家機關有關部委、專家諮詢委員會意見。但它沒有向真正受影響的公眾作諮詢，表明其戰事經濟模式仍舊。新區將依託5G率先大規模商用、IPv6率先佈局，因而它是一個智慧城市。

新區將建設數位化智慧交通基礎設施。通過交通網、資訊網、能源網“三網合一”，基於智慧駕駛汽車等新型載運工具，實現車車、車路智慧協同，提供一體化智慧交通服務。

雄安新區空間佈局與現有中國大城市不同之處是改變了以往單中心“攤大餅”式發展模式。其城市規劃為“一主、五輔、多節點”。“一主”即選擇容城、安新為主城區，先行啟動建設。

“五輔”即雄縣、容城、安新縣城及寨裡、胥崗五個週邊組團為生態隔離帶。“多節點”即讓若干特色小城鎮和鄉村構成網路化的城鄉體系。起步區面積為20—30平方公里。對比香港島佔地面積為80.5平方公里。

整個新區規劃範圍包括雄縣、容城、安新三縣行政轄區（含白洋澱水域），任丘市鄭州鎮、苟各莊鎮、七間房鄉和高陽縣龍化鄉，規劃面積1770平方公里，建設用地為530平方公里。對比香港陸地總面積為1106.42平方公里，已建設的土地為265平方公里。

在綠色規劃下，它比現時的新加坡的垂直綠色城市也不如，是明顯失敗之處。父權主義和崇尚暴力的中共不能理解環保觀念。

李克強表示，“雄安新區將落實習近平的“房子是用來住的、不是用來炒的”指示。但在雄安縣政府於4月2日禁止售賣樓房前，當地房子的價格已經暴漲至每平方米11,000元人民幣。可見，官僚爭不過地產商。中國的很多領域已進入了資本的規律，不受行政指令控制。這是中共頭痛之一。

最重要的是，雄安新區雖然坐落河北，距北京、天津105公里，距石家莊155公里，距保定30公里，距北京新機場55公里。但雄安新區內將建設高鐵站，居民可以20分鐘到北京新機場，30分鐘到北京、天津，60分鐘到石家莊。

新區完善高速公路網後，駕車60分鐘到北京、天津，90分鐘到石家莊。起步區路網密度為10至15公里／平方公里，公共交通占機動化出行比例為80%，並推廣“公交+自行車+步行”的低碳出行模式。

問題是北京人口堵塞，有不少是窮人，即低端人口。雄安新區明顯地是有錢人和貪官的理想高尚住戶區。這即是說，雄安新區無法真正地解決北京的非首都功能。它只益了河北省。

自由貿易試驗區與自由貿易港的區別

海南經濟特區是1988年第七屆人大一次會議的《關於設立海南省的決定》和《關於建立海南經濟特區的決議》決定。

自貿港需要在市場准入、金融制度、稅收等方面做出一系列特殊的政策安排。自貿區側重於貨物流通方面的開放，而自貿港則包括貨物流通、貨幣流通、人員流通、資訊流通，零或極低關稅。自貿區很多需要申報，自貿港則不需要申報貨物就能自由進入。海南建設全島的自由貿易試驗區是希望過渡至自由貿易港。

海南自由貿易區

2011年，青島、天津、上海和深圳等自由貿易區成立；2013年，上海；2015年，廣東、天津、福建；2017年，遼寧、浙江、河南、湖北、重慶、四川、陝西自貿區等揭牌成立。

海南自由貿易區最值得討論的原因是它的大。當前中國有11個自由貿易試驗區，總體面積1000平方公里左右，而海南全省面積是3.5萬平方公里，遠超1000平方公里的香港和新加坡，以及不足4000平方公里的迪拜，它可以成為全球最大自由貿易港。

自由貿易區政策框架的核心包括政策環境寬鬆、投資領域開放、金融開放、貿易自由化、監管寬鬆、稅賦寬鬆等8個方面。它是針對台灣，也是針對中美貿易戰的。

十九大報告

2017年10月18日十九大報告中的“五、貫徹新發展理念，建設現代化經濟體系”有六點。其六為：“賦予自由貿易試驗區更大改革自主權，探索建設自由貿易港。創新對外投資方式，促進國際產能合作，形成面向全球的貿易、投融資、生產、服務網絡，加快培育國際經濟合作和競爭新優勢。”

中共中央國務院關於支持海南全面深化改革開放的指導意見

這份文件是賦權海南建設自由貿易試驗區和自由貿易港的基礎。它的“重大意義”是要證明，在中共的政治模式下，“興辦經濟”可行。其二是“探索可複製可推廣的經驗”，它所指的全國是包括台灣的。中共的“一國兩制”模式已經破產。它相信，民主、自由和法治不是資本的基石，或前提。因此，中共的整個改革開放策略是繞過政治改革，打做一個成功的經濟大區，以此模式管治未來可能被收服的台灣。

它的戰略定位是：

- 面向太平洋和印度洋。
- 國際旅遊消費中心。
- 打做海洋強國、為“一帶一路”和軍民戰略地位。

其發展目標是：

- 2020年確保農村脫貧。
- 2025年自由貿易港制度初步建立。
- 2035年自由貿易港的制度成熟。

其建設體系為：

- 推動旅遊業。
- 實施網路、大資料戰略、“互聯網+”、物聯網、大資料、衛星導航、人工智慧。
- 發展虛擬實境技術。
- 推進天然氣水合物、海底礦物商業化、海水淡化、海洋可再生能源、海洋牧場。

其發展戰略為：

- 深海探測、海洋資源開發利用、航太科研、國家南繁科研育種基地、設立國際離岸創新創業區、發展智慧財產權證券化和信用擔保機制。
- 推進集團層面混合所有制改革，公司法人制度。
- 政府直接授權國有資本投資、運營公司，制訂公平競爭法，農場企業化，土地資產化和資本化，建立不同權屬、不同用途建設用地價調節機制、設立國際能源、航運、大宗商品、產權、股權、碳排放權等交易場所，規範政府和社會資本合作（PPP）模式，航空分類管理改革。

——海口機場擴建，開展三亞新機場、儋州機場、東方/五指山機場工程。

其全面格局為：

- 在海南全境建設自由貿易試驗區，探索自由貿易港政策。
- 形成法治化、國際化、便利化的營商環境的市場環境；轉變政府職能；貿易和投資自由化，對外資全面實行准入前國民待遇加負面清單管理制度；服務業對外開放。
- 不以轉口貿易和加工製造為重點，而以發展旅遊業、服務業和高新技術產業為主導；擴大現有的59國外國人入境旅遊免簽。

——構建金融管理體系，金融監管協調機制，金融風險管理；強化進出境安全准入管理，建立檢驗檢疫風險分類監管機制。

其國際旅遊消費中心機制為：

- 提高免稅購物限額；三亞郵輪母港發展：放寬遊艇管制；允許外資設立演出經紀機構，設立演出場所；有限度允許旅遊酒店接收境外電視頻道；發展賽馬項目，支持打造國家體育旅遊示範區。探索發展競猜型體育彩票和大型國際賽事即開彩票。探索從空間規劃、土地供給、資源利用等方面支援旅遊項目建設。
- 支持旅遊企業上市融資，酒店連鎖經營，大型消費商圈，完善“互聯網+”、“智慧店鋪”、“智慧商圈”。
- 允許中外合資旅行社從事除臺灣地區以外的出境旅遊業務；推動（ISO）品質和環境管理體系認證，引入國際一流賽事；舉辦國際商品博覽會和國際電影節。

服務和融入國家重大戰略為：

- 加強南海維權。
- 配合“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和地區合作。
- 建設文昌國際航太城。
- 發展泛珠三角區域合作機制，密切與香港、澳門在海事、海警、漁業、海上搜救等領域的合作，積極對接粵港澳大灣區建設。加強與臺灣地區在教育、醫療、現代農業、海洋資源保護與開發等領域的合作。

其人才發展制度包括：

- 鼓勵國內知名高校和研究機構在海南設立

分支機構。

——取消行政級別。創新“候鳥型”人才引進和使用機制，設立“候鳥”人才工作站，允許內地國企、事業單位的專業技術和管理人才在海南兼職兼薪。允許外籍和港澳臺地區技術技能人員在海南就業、永久居留。允許在中國高校獲得碩士及以上學位的外國留學生在海南就業。

——在幹部制同時建立公務員機制。

政治制度

它完全迴避言論自由、自由選舉、新聞自由，而堅持兩份文件，2018-03-04的《中共中央關於深化黨和國家機構改革的決定》和2018-03-21的《深化黨和國家機構改革方案》。

《中共中央關於深化黨和國家機構改革的決定》

中共將它視為可以滿足，“是實現“兩個一百年”奮鬥目標、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必然要求”，這本身已屬荒唐。且看看這文件內容。

其所謂改的地方是：

- 共產黨的機構設置和職能配置；
- 黨政機構職責交叉和權責脫節問題；
- 政府機構職責缺位和效能不高；
- 中央和地方機構職能，權責劃分不合理問題；
- 完善權力運行制約和監督機制。

文件清楚表明黨政不分家。

黨的部份

三、堅持黨的全面領導的制度

黨政軍民學，東西南北中，黨是領導一切的。其下的是（一）健全黨領導體制機制；（二）強化黨在同級組織中的領導地位；（三）發揮黨的職能；（四）堅持中央集權；（五）加強黨的紀律檢查體制。

從這五點看，這是自欺欺人的八股，因為，當共產黨強大，人民反抗聲音弱的時候，根本無須任何改革；但當人民聲音壯大的時候，這五點又不成空話。

政府機構改革

其轉變政府職能基本上依賴市場調節，其改革要求較為明確。也就是說，國務院的角色越來越重大，公務員化也較明顯。

（一）財政、金融等使用宏觀調控；運用大資料、雲計算等強化經濟監測；運用反壟斷法防止市場壟斷，推進法治政府建設；理順統一稅制和分級財政的關係；使用貨幣政策調控金融；加強智慧財產權保護；構建統一審計監督體系；優化政府對外經濟、出入境人員服務管理。

（二）政放權，減少審批，政府儘量不對直接配置市場資源和干預市場活動，運用仲介服務，放寬服務業准入限制，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營造良好營商環境。

（三）統籌和集中行政處罰和執法資源，精簡執法隊伍；一個部門只設有一支執法隊伍；減少執法層級。

（四）實行最嚴格的生態環境保護制度。設立國有自然資源資產管理和自然生態監管機構，統一行使全民所有自然資源資產所有者職責，統一行使所有國土空間用途管制和生態保護修復職責，統一行使監管城鄉各類污染排放和行政執法職責。

（五）促進公共資源向基層延伸、向農村覆蓋、向邊遠地區和生活困難群眾傾斜；加強社會保障、教育文化、法律服務、衛生健康、醫療保障；推動教育、文化、法律、衛生、體育、健康、養老等公共服務；推進非基本公共服務市場化。

（六）從事前審批轉到加強事中事後監管上來。推進“雙隨機、一公開”和“互聯網+監管”；加強信用體系建設、信用監管，加大資訊公開力度，發揮同行業和社會監督作用。

（七）精幹政府部門內設機構；明確行政問責，加強日常工作考核，建立獎優懲劣的制度；各部門資訊共用。

五、黨政軍改革

這部份還是中共的原有格局，但當中有一些實質變動。

- (一) 保證黨統一領導。
- (二) 強化人大及其常委會在立法，預算決算、國有資產管理。
- (三) 增強群團組織的政治性、先進性、群眾性，利用它來向基層配備服務資源，承擔公共，讓它成為黨和基層群眾的橋樑和紐帶。
- (四) 加強對各類社會組織的監管。
- (五) 不再設立承擔行政職能的事業單位；實施公益類事業單位改革，理順事業單位同主管部門的關係，推進管辦分離，強化公益屬性。
- (六) 按照軍是軍、警是警、民是民原則，改革武警部隊、公安現役部隊、民兵和部隊改革。軍隊辦的幼稚園、企業、農場交給地方辦。組建退役軍人管理保障機構。

六、設置地方機構

- (一) 省、市、縣各級涉及黨中央集中統一領導和國家法制統一、政令統一、市場統一的機構職能要基本對應。
- (二) 賦予省級及以下機構更多自主權；經濟社會管理事項下放給地方；允許地方設置機構和配置職能。
- (三) 允許“一對多”，由一個基層機構承接多個上級機構的任務；也允許“多對一”，由基層不同機構向同一個上級機構請示彙報。
- (四) 規範垂直管理體制和地方分級管理體制。

七、推進機構編制法定化

- (二) 強化黨對機構編制工作的集中統一領導，統籌使用各類編制資源。

八、加強黨對深化黨和國家機構改革的領導

黨中央統一領導深化黨和國家機構改革工作。各地區各部門，黨委和政府要履行主體責任。涉及機構職能調整的部門要服從大局。

在黨中央統一部署下啟動中央、省級機構改革，省以下機構改革在省級機構改革基本完成後開展。條件暫不具備的先行試點、漸次推進。

《深化黨和國家機構改革方案》

這份文件是3月4日《中共中央關於深化黨和國家機構改革的決定》的具體落實，對中共的官僚機制有重大改動，當中一定涉及權力再分配，但外人很難知道。與南海試驗區和自由貿易港相關的可能是：

- (一) 組建國家監察委員會，統一黨的反腐敗工作，組建國家監察委員會，同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合署辦公，實行一套工作機構、兩個機關名稱，不再保留監察部、國家預防腐敗局。
- (三) 組建中央審計委員會。
- (六) 組建中央和國家機關工作委員會，作為黨中央派出機構，不再保留中央直屬機關工作委員會、中央國家機關工作委員會。
- (十) 中央組織部統一管理公務員工作，不再保留單設的國家公務員局。
- (十二) 中央宣傳部統一管理電影工作，指導監管電影製片、發行、放映工作，組織對電影內容進行審查，指導協調全國性重大電影活動，承擔對外合作製片、輸入輸出影片的國際合作交流等。
- (十七) 不再設立中央維護海洋權益工作領導小組，有關職責交由中央外事工作委員會及其辦公室承擔，在中央外事工作委員會辦公室內設維護海洋權益工作辦公室。

後記

從雄安新區和海南自由貿易港的規劃中，看到習近平對中共設計的專制發展經濟很有信心。他對一改中共擔心地區坐大的憂慮，大幅改動地區規劃。

雖然，當中完全沒有觸及民主和民權，但它的尚方寶劍，黨中央控制一切的《深化黨和國家機構改革方案》與放權地方有一定矛盾。《深化黨和國家機構改革方案》並非一紙空文，當中有很多具體工作，涉及政府機構的較多，涉及黨務的較少。這是一種明顯的中央集權專制，又由於習近平修憲設立了終身制。這等於帝制復辟，最有利建立新的帝國主義。在南北韓會談中，習近平似乎採取一個相對克制的做法，但他的政治設計和指導思想其實是相當侵略性的。他的所有安內都是為向外擴張。

改革Wells Fargo富國銀行高管報酬的提案（來論）

趙京

2017年7月10日，考慮到公司高管的離譜高薪已經成為美國經融危機和社會不公的主要因素之一而引起了社會的極大擔憂[1]，鑒於富國銀行這兩年來的一系列導致CEO等高管們被趕下臺等醜聞，我提交提案要求改革公司高管報酬政策、包括採納外部獨立專家意見的提案[2]。引用今年剛訴諸表決的我在蘋果公社股東大會的類似提案，我指出僅雇用諮詢公司提供高管報酬資料的局限，而應該導入諸如CEO與員工報酬比率、美國的最低工資和失業率等社會因素考量。而且，正如華爾街日報2017年7月4日報導的那樣，美國公司公佈的高管報酬隱瞞了他們的實際收入。

兩個月後，我接到公司高級副總裁兼高級律師Schaffner女士的電話和電郵，並於10月2日與她和法務部門的Oliphant女士進行了一個小時的電話會議。我主要介紹了自己從中國和日本逃來美國的民主運動背景和十幾年前從雅虎公司開始的人權提案，到近年來關注金融公司和高管報酬等企業治理的經驗。她們很感興趣，保證要向別的部門負責人報告。

經過幾番聯繫，今天我又與她們加上負責報酬的常務副總裁Branca、負責企業社會責任的Rizer先生舉行了一個小時的電話會議。他們介紹了公司在報酬政策上的改進（如最低員工從每小時13美元開始）和社會貢獻（如每年3億美元、全美第3多的捐助），但在高管報酬方面，還停留在一般公司所採用的“市場”和“才能”、業績的考量。我指出：一、公司雇用的諮詢公司都只提供高值資料，因為它們列舉的同行都是業績好的美國公司，更沒有與報酬不算太高的日本、歐洲同行公司的高管們比較；二、金融公司的公共服務的業務性質不同於競爭性激烈的高科技行業，不能與後者的高管們攀比高薪；三、富國銀行在近來的醜聞事態中面臨更嚴厲的國會、公眾的關注，減低幾個高管的報酬是很簡易、有效的方法改善公司的形象和治理；四、從長遠來看，作為美國金融危機的一個重要原因，美國公司高管們不斷增長的報酬不可能維持下去，富國銀行

可以帶一個好頭。為什麼美國的公司高管們不可以用金錢以外的報酬（如榮譽、社會貢獻、愛國心）來衡量呢？

會議結尾，與別的公司一樣，他們希望我撤回提案。我猶豫許久，至今還後悔自己一時心軟撤回了2016年提交給埃克森美孚公司的高管報酬政策提案[3]，失去了與其CEO（現國務卿）交鋒的機會。於是我回復他們，首先感謝富國銀行的積極態度，以後也用不著提案了；但是，他們沒有明確表明會採納我的提案的精神和步驟，所以，我希望公司的董事會像穀歌公司的董事會2010年在股東大會上對我的人權提案的聲明（哪怕是反對聲明）一樣，公開對股東、國會和證券交易委員會等政府部門以及普通公眾表達正式明確的政策。

2017年12月15日

補充：富國銀行在3月14日發佈的2018年股東大會（4月24日召開）材料上把我的提案列為第5號付諸表決，董事會發佈的反對聲明為了獲得多數股東支援，部分接受了我的提案的精神，董事會主席和CEO宣佈把最低員工的報酬提高為每小時15美元加福利[4]。每小時15美元的最低報酬是今年美國勞工運動的一個主要訴求。

註腳

[1]例如，斯坦福大學商學院2016年2月發表的關於美國公眾對CEO報酬態度的研究報告，其結論是CEO們報酬高得離奇，應該大幅減低。Americans and CEO Pay: 2016 Public Perception Survey on CEO Compensation <https://www.gsb.stanford.edu/faculty-research/publications/americans-ceo-pay-2016-public-perception-survey-ceo-compensation>

[2] http://cpri.tripod.com/cpr2017/wf_proposal_2018.pdf

[3] 趙京，“埃克森美孚的高層報酬政策提案”，2016年2月23日。

[4] <http://cpri.tripod.com/cpr2018/2018proxy5.pdf>

土耳其埃爾多安和他的對手

伊斯卡拉、科瑟俐落格魯、茲爾伽斯特

埃爾多安圖謀的獨裁統治是不穩定的。本文談論土耳其社會的矛盾和裂痕。

埃爾多安的權力顯得沒有限制。看起來，土耳其總統似乎將永遠統治下去。

自去年四月公投以來發生的事件，似乎證實了這種悲觀的前景。這次投票使埃爾多安和他的政黨正義與發展黨(AKP)獲得了一個關鍵的勝利，帶來了憲法的改變，建立了公然的獨裁制度。清洗和鎮壓隨之而來了。

然而，更近一步的觀察顯示，埃爾多安企求的獨裁統治是不穩定的。在全民公決中，所有暗藏而蠢蠢欲動的社會矛盾，挫敗了AKP鞏固其政治統治地位的努力。從那以後的幾個月裡，這些矛盾就沒消失過。

公民投票以後

儘管使用了國家恐怖和公然欺詐的手段，埃爾多安在公投中只不過贏得了51%的贊成票。他不再能夠通過“軟的”民主手段獲得大眾的同意，於是他訴諸於鎮壓及腐敗手段，支援聖戰組織和其他極端反動團體。鎮壓進一步打擊了埃爾多安在該國和社會的對手，後者迫切地等待著他的垮臺。

埃爾多安的目標是分化社會，把政治話語野蠻化，以刺激極右分子，從而支撐其右翼根據地。他在以前被居倫主義者(Gülenists)(流亡教士和埃爾多安前盟友費特胡拉·居倫[Fethullah Gülen]的追隨者，埃爾多安指責居倫煽動2016年7月的失敗

政變)佔據的媒體和商業崗位上安置了他一些最激進和狂熱的支持者。

但他的計劃並非萬全的。一方面，埃爾多安的好戰行動可以促進政黨正義與發展黨(AKP)在國家和更廣泛社會中獲得右翼支持。另一方面，在政黨正義與發展黨(AKP)基本選民中，仍然有很大一部分人，即便不會斷然反對他們黨所採取的獨裁言論，但心裡卻感到失望。因此，埃爾多安是在走鋼絲：他必須始終考慮在他的群眾基礎和激進的好戰分子之間的適當平衡，他需要這兩者以保住權力。

鎮壓

自從2016年7月政變嘗試 --- 該政變很快被壓下，但埃爾多安用其作為鞏固權力的藉口 --- 以來，超過15萬人被解雇，約13.2萬人被拘留，5800多名學者失業，近200媒體被關閉，300多名記者被捕。任何有可能煽動批判性或對立性活動的人都有遭受無端指控而被逮捕的危險，並無例外地貼上“FETÖ”(費特胡拉恐怖組織)或PKK(庫爾德斯坦工人黨、一個庫爾德人民兵解放組織)的標籤。

12月頒佈的最新法令規定，對用暴力或已經用過(暴力)行動以挫敗政變企圖的平民給予豁免權。雖然政府官員表示，法律只涵蓋2016年7月15日和次日的晚上，但它的範圍針對任何被視為企圖政變或恐怖事件的社會活動。這顯然是一項先發制人的措施，旨在解決潛在的起義或內亂，為親政府團體和民兵提供法律庇護。

鎮壓和鞏固權力的範圍，從街道層面 --- 示威禁令、

用土耳其標誌代替庫爾德人的，等等 --- 伸展到政治生活的制高點。國家最高法院的領導人在埃爾多安前鞠躬，或者至少在政治上支持他。但僅僅這樣還是不夠的。司法機構和國家機器向總統的屈從必須是結構性的、法律意義上的，而不是個人的。因此，幾近一半的最高司法委員會的法官和檢察官被替換了。該委員會新選出的成員中，有五人是由政黨正義與發展黨(AKP) 提名的，另兩名是其法西斯盟友 MHP (民族主義運動黨) 提名的。同樣，根據議會一名成員的報告，法官和檢察官機構的1341個公開職位中，有90%的人是與政黨正義與發展黨(AKP) 當地組織有直接或間接關係的人員。政府的所有高級官員現在都由總統挑選 (如果沒有被任命的話)。

在教育領域，這一體系正被印上更加保守的伊斯蘭色彩。去年夏天，教育部從教科書中刪除了有關進化論的所有段落，並增加了關於聖戰的章節以及反對 FETÖ(費特胡拉恐怖組織)、庫爾德工人黨和未遂政變的鬥爭內容。高中和大學兩級的混合宿舍已經解散。

埃爾多安還對情報機構和軍方加緊了更多的控制，擔心軍隊---傳統上是土耳其政治伊斯蘭的對手---對他不夠忠誠。未遂政變後進行的內部調查表明，軍隊高層中的伊斯蘭派別確實是弱小的。雖然有人支持埃爾多安本人，但在全民投票中投 "不" 者的比例卻格外高。

因此，情報機構和軍方的相對自主權，將因為逐步地服從總統而被廢除或極小化。這方面最重要的一步，是去年8月採取的措施。情報機構現在直接與總統職位掛鉤，並有權在軍隊內部進行調查以及開除其任何工作人員。軍人晉升的標準已經降低。軍事司法系統已被完全消除。軍隊內部的法律程式已移交給民事法庭和檢察官。

最後，在歷史上第一次，在8月舉行的最高軍事委

員會 (YAS) 上，總統和政府比軍隊有更大的發言權。YAS做了軍隊裡所有的晉升決定。在所有最高指揮官的職位上，都任命了新的幹部，有部分任命與資歷排名不合。

與此同時，在政變未遂之後，被居倫主義 (Gülenists) 幹部清除出軍隊以及部分被監禁的極端民族主義者回歸，填補居倫主義者 (Gülenists) 留下的空白。在多大程度上，所有這些事態發展將會導致在軍隊內建立埃爾多安派 (Erdoğanists)，或者可以恢復典型的民族主義親北約集團 --- 以及它們將如何影響軍隊的戰鬥力 --- 仍然是一個懸而未決的問題。但顯而易見的是，埃爾多安在國家和社會中獲取了更大的權力。

材質疲勞神話與 羅馬 (Röhm) 綜合症

試圖用權力的直接行使來取代憲政政治的每一個過程都面臨著兩個基本問題：一方面，許多幹部 --- 這些人要麼不願意冒殺頭的風險，要麼不太忠誠或專制 --- 退出專案計劃；另一方面，挑戰者應運而生，想像自己是 "更厲害的" 法西斯。讓我們稱第二種現象為 "羅馬 (Röhm) 綜合症"。[1]

這兩個過程在土耳其很有作用，兩者立刻催生了政黨正義與發展黨(AKP) 的霸權危機。

材質疲勞的神話

隨著時間的推移，人們清楚地發現，公投的結果，帶給埃爾多安的困擾，比最初出現的更甚。他認為，有必要從公民投票中所犯的錯誤中吸取教訓。為了強調他的論點，他想出了材質疲勞的說法。[2] 在政黨正義與發展黨(AKP) 的十五年統治期間，埃爾多安說，某種疲態蔓延進入了黨幹部中。無論他們過去的成功是什麼，許多人不

再可靠。這並不是空談：許多幹部被迫下臺，一些重要城市的 政黨正義與發展黨(AKP) 市長被迫辭職。

但是，材質疲勞的說法是一個空話---這些措施旨在拉攏完全忠於埃爾多安的年輕幹部，而不是更有能力的人 --- 並試圖掩蓋更深層次的結構性問題。[3]

公民投票是通過欺詐贏得的，而且只是小贏；儘管受到鎮壓，社會抵抗仍在繼續。其結果是，法西斯化進程的政治和經濟代價正在增加，國際孤立正在加大。[4] 這在 政黨正義與發展黨(AKP) 幹部和他們的黨知識份子中激起了不安全感 and 煩躁。而用年輕的幹部代替老兵將一事無成。相反的是：消除 政黨正義與發展黨(AKP)裡的溫和持不同政見者的聲音，會加深危機。

伊斯蘭陣營內部發生了嚴重的劇變，範圍廣泛。那些在 政黨正義與發展黨(AKP) 中偶爾鼓吹使用 "軟性" 方法的人要麼被清除，要麼被逐出黨和政府。政黨正義與發展黨(AKP) 共同創始人、前總統阿卜杜拉·居爾以及前總理艾哈邁德·達武特奧盧 (Ahmet Davutoğlu) 等巨頭都是這方面的領導人物。[5] 他們批評與 國民運動黨 (MHP) 的聯盟，願意改善與西方的關係，以及繼續與歐盟進行嚴肅的談話和整體推進一個比較 "寬鬆" 的政治環境。

放眼這個陣營之外，反動和原教旨主義的記者和宗教知識份子都對埃爾多安不是 "伊斯蘭" 感到不安。他與非伊斯蘭國家官僚機構的結盟使他們越來越不舒服，那些站在他一邊的人必須表現出奇怪的扭曲，使他的許多政治舉動 (與以色列、敘利亞等國的關係) 合法化。

不僅是 政黨正義與發展黨(AKP) 陣營和伊斯蘭教的圈子裡有不安和不滿。在他們事實上的聯盟

夥伴，由巴契利(Devlet Bahçeli) 領導的MHP內部，情形也是這樣。MHP 與 政黨正義與發展黨(AKP) 建立了夥伴關係，希望能在國家官僚機構、軍隊和員警部隊中擔任領導職務。這一代價把他們自己完全與埃爾多安綁在一起，這擾亂了更加民族主義的黨的基礎。前MHP 領導幹部瑪麗·哈里森 (Meral Akşener) 創立了新的組織，IYI黨 (善心黨，Good Party)，並且許多黨員 (特別是年輕人) 轉向哈里森或其他政治組織。

羅馬 (Röhm) 綜合症"

在埃爾多安的脆弱聯盟中，為了保住自己的位置，有幾個群體是潛在的 "羅馬 (Röhm)" 派系。其中第一個來自 政黨正義與發展黨(AKP) 的內部：伊斯蘭派別。

考慮到埃爾多安自己的保守宗教政治，這可能看起來令人驚訝。但他最近的務實轉向，旨在減少土耳其的國際孤立，與以色列建立更好的關係，結束對敘利亞聖戰組織的軍事和其他援助，但伊斯蘭主義者並不怎麼買帳。自從艾哈邁德·達武特奧盧 (Ahmet Davutoğlu) 的總理職務被免以來，這場衝突一直在醞釀之中，而且經常爆發在公眾的視野中。不同陣營的代表在媒體上互相攻擊，互相指責對方是 "FETÖ" 的支持者。但現在，這個派系已經成功地被邊緣化了。

另一位候選人是極端民族主義者，法西斯主義的愛國黨(VP, Vatan Partisi)。在民族主義和對所有庫爾德人的憎恨方面，他們與 MHP 競相爭勝(並與 MHP 爭奪極端民族主義支持者)，但他們卻是堅定的世俗主義。[6]儘管愛國黨(VP)並沒有大基礎，但他們的幹部被安置在各種政府機構之內。正是他們帶頭努力重建和正常化與俄羅斯和敘利亞的關係。然而，他們遠非 政黨正義與發展黨(AKP) 的戰略盟友。他們不只是簡單地支持埃爾多安，而是在盯著權力本身。每當他們

看到一個縫隙機會，就會迅速改變航向，開始攻擊埃爾多安和 政黨正義與發展黨(AKP)。

第三個派系可能出自國家官僚機構。二十世紀九十年代，許多政界人士和高級政府官員深深捲入了對庫爾德人民的 "骯髒戰爭"，這些人再次處於有影響力的地位。據推測，有一個廣泛的網路，其涉及範圍，從右翼政治家和高級國家官員到有組織的犯罪。

在這裡，有必要強調一種在法西斯化過程中很常見的現象：領導人的支持者認為自己是 "小領袖"。正是這種動力，使得右翼和法西斯的政治運動吸引了一些人。土耳其的許多 "小領袖" 於是表現得極為自傲。他們是最接近埃爾多安的一夥，也是他最狂熱的支持者。

總而言之，自由保守派和 "溫和" 派大部分叛離了黨，許多有經驗的幹部以不同的原因 ("效率低下"，"材質疲勞" 等) 被逐出了。與此同時，與埃爾多安一起管理國家的聯盟相當脆弱，所有的盟友都在處理自己的內部矛盾和問題。

讓埃爾多安出汗的兩個問題：孤立的外交事務和對大資本的不滿。

外交孤立

歐盟國家，特別是德國，對土耳其的批評相當克制。原因很簡單：土耳其80% 的外國直接投資來自歐洲。因此，雖然 政黨正義與發展黨(AKP) 政府，特別是埃爾多安已經成為歐洲許多地區的蔑視物件，並失去了大多數歐盟政府的信任，但大資本的參與和利益阻止了較為強硬的姿態。但會持續多久呢？

與此同時，土耳其與美國的關係不是鬧鬧彣彣，而是更糟。在兩名領事工作人員因涉嫌與2016未

遂政變有聯繫而被捕後，美國暫停了在土耳其的簽證服務，後者則作出了同樣的報復。[7] 即便兩個國家從那以後恢復了全部的簽證服務，他們的關係依然是冷若冰霜。

這兩個國家之間日益冰冷的另一個原因，是紐約法院對勒紮·紮拉貝 (Reza Zarrab) 的指控，這名土耳其-伊朗商人在2016美國被捕前與 政黨正義與發展黨(AKP) 有著極其密切的聯繫。對紮拉貝的主要指控是，他有一項避免美國制裁而與伊朗進行貿易的計劃，更重要的是，他得到土耳其政府的協助，繞過制裁。[8]

媒體和埃爾多安都認為紮拉貝案是針對土耳其的政治行動，而且不是毫無理由的：美國政府正在利用紮拉貝的案件打擊他的土耳其對手，這並非不可能。美國和西方長期以來一直向土耳其發出的信號是，它們高估了土耳其地緣政治的作用和力量。雖然現在的後果似乎只限於涉及銀行的貨幣罰款，但整個事件應該被解讀為對土耳其政府的進一步警告。

關於中東，地緣情況如下：與伊朗的和解並沒有 (尚未) 獲得聯合打擊伊斯蘭國的結果。靠近伊朗的民兵比靠向土耳其的更有戰鬥力，這就是為什麼土耳其經常抱怨該地區 "侵略性的波斯民族主義" 的原因。土耳其在2016年曾進軍敘利亞北部，但它只能減緩庫爾德運動的推進，而庫爾德人在那裡贏得了顯著的政治自治權。[9] [10] 軍事慘敗顯露了土耳其軍隊的絕望狀態。隨著時間的推移，入侵的政治和經濟代價將會增加。

土耳其阻止庫爾德人運動的企圖一再受挫。許多月來，政府官員試圖說服美國，採取沒有 人民保護組織 (YPG) 和 婦女保護組織 (YPJ) 參加的拉卡 (Raqqa) 行動，因為YPG 和 YPJ是庫爾德民兵，與庫爾德工人黨合作密切。但從美國、歐盟、俄羅斯和伊朗的角度來看，土耳其太不穩

定，頑劣難以信賴。拉卡（Raqqā）後來被一支由 YPG/YPJ 領導的部隊解放了。然而現在，土耳其威脅要進軍敘利亞北部的阿夫林（Afrin）和曼比季（Manbij）的庫爾德小行政區，美國和俄羅斯長期以來一直在阻止這一進程。[11] 它已經開始炮擊阿夫林（Afrin）。

但這是反常現象。幾個月來，在一些地方，政黨正義與發展黨（AKP）未能對庫爾德人採取措施，有些人感到失望。去年秋季，阿布杜爾卡迪·瑟爾維（Abdülkadir Selvi），一個與政黨正義與發展黨（AKP）非常接近的知識份子說，土耳其“失去了它的魅力”，因為政府持續威脅伊拉克北部庫爾德地區政府，反對其獨立公投，但不能改變事情的任何結果。這種修辭有明確的政治目的。有關“黑暗勢力對土耳其採取行動”的狂暴，贏得了右翼幹部和草根活動家的同意。此外，防止在伊拉克北部形成獨立的庫爾德斯坦 --- 不管它在政治上對 政黨正義與發展黨（AKP）有多近，就像在更保守的巴爾紮尼（Barzani）領導人的情況下 --- 是阻止住在土耳其的庫爾德人民族意識增強的一種手段。[12] 當然，當獨立的公民投票來臨時，整個右翼陣營噴出火和硫磺。

然而，這裡的問題與一般的法西斯主義化是一樣的：侵略性的姿態是無關緊要的空話，如果這一點變得明顯的話，那麼建立在侵略立場之上的合法性就會逐漸下降。

驚恐的資本

這種孤立主義和冒險主義，加上內部的不穩定，使經濟非常脆弱。旅遊業的崩潰和資本流入的減少只是問題的一部分。[13]

對全球經濟的後特朗普衝擊和對美聯儲量化寬鬆政策的逆轉，使大量熱錢流入土耳其。然而，這些投資對不穩定的反應非常敏感。當美聯儲最

終結束寬鬆的貨幣政策時，土耳其將難以進入外匯市場。

2016年底，土耳其統計研究所（TÜİK）大大修改了其資料收集和計算方法。因此，增長率突然上升，土耳其幾乎可以聲稱它有世界上最高的儲蓄率。該研究所沒有透露它是如何改變其計算方法的，但批評家指出了其重要的不一致之處。

無論是操縱的增長率，還是親政府媒體的興奮，都未能欺騙或打動大資本。去年9月，土耳其最大的工業協會，土耳其工商協會（TUSIAD）宣佈，該國已經達到了以消費和建設為基礎的增長的極限，並要求政府的立即回應。

很大一部分的土耳其經濟得以維持下去，要歸功於信貸擴張和商業的激勵措施，包括主要建設項目的利潤保證、免稅、債務重組協議等。這些措施大幅增加了預算赤字，需要對債務上限進行調整。[14]

2017年，土耳其里拉是對美元表現最差的貨幣。除了推高通脹率，里拉的貶值將對私營部門造成嚴重破壞，因為這些部門嚴重地依賴於生產的進口。工業投資正在下降，建築投資繼續在所有投資中占很大比例。[15] 生產部門的前景可怕，並且利率仍然太高。

埃爾多安對大資本要求結束緊急狀態感到憤怒。在7月向商界領袖發表講話時，他說得很清楚：是否有任何經濟問題與緊急狀態有關？[16] 我們將使用緊急狀態干預發出罷工威脅的工作場所。就是這麼簡單。

事實上，大資本從埃爾多安的統治中獲利。股票市場（100）指數去年的實際增長率為27%。大公司，如薩班斯控股集團（Sabancı Holding）和農業銀行（Ziraat Bank），其利潤增加了約 20%，而

最大的 Koç集團則在2017年上半年增加了50%的利潤。[17] [18] [19]

但經濟的總體表現和增長前景仍然不明朗。永久的政治不穩定和侵略性的外交政策導致外國直接投資停滯不前，對貿易產生不利影響。外國資本流向的逆轉或一系列的違約，可能會顛覆平衡，造成經濟的厄運。土耳其資本擔心，政黨正義與發展黨(AKP) 霸權危機的加劇，可能會引發一場危及整個系統的動盪。它的歐洲夥伴想要一個憲法上安全 穩定的秩序，允許資本平穩地積累。埃爾多安保證高利潤，但他的做法是脆弱的，容易引發危機。

這些擔憂解釋了為什麼土耳其工商業協會(TÜSIAD) 和小企業協會一直在抱怨：他們迫切希望恢復民主，讓社會對話正常化，與歐洲聯盟建立更密切的關係，支持外國資本政策，以及現代化並鞏固該國與歐盟的關稅同盟。

反對派的狀態

來自下層的壓力是霸權危機的主要動力。一個不能粉碎內部反對派的法西斯領導層會失去其合法性---對國家的控制，是其信用的主要來源之一。因此，失敗的代價不斷上升。現在看來，政黨正義與發展黨(AKP) 不能完全控制土耳其。

共和人民黨(CHP)和左派

去年夏天，主要反對黨---共和人民黨(CHP)，舉辦了"正義進軍" 和 "正義大會"，吸引了至少100萬人。從那以後，很多人都談論該黨及其領導人，凱末·寇里達羅(Kemal Kılıçdaroğlu)，談論其 "抵抗力"。但對寇里達羅的這種看法是有缺陷和誤導的。共和人民黨(CHP)不只是形成各種反對埃爾多安統治的運動的一極，它還試圖以不威脅制度的方式來疏導人們的憤怒。共和人

民黨(CHP)採取極端被動的立場，除非有任何改變，否則它將無法掌權，至少靠本身無法掌權。

在政府宣佈公投結果後，新的抵抗階段立即開始。在投票過程中，許多可疑和明顯的欺詐事件促使數以千計的人走上街頭，宣稱全民公決是非法的。[20]這些抗議活動主要集中在土耳其西部的大城市，首先是伊斯坦布爾。但是，持續示威活動一周的決定，有助於鞏固人們認為公投結果是欺詐性的看法。事實上，政黨正義與發展黨(AKP)及其宣傳人員從未設法組織反駁的說法，它的基礎一直沒有得到有效的調動。即使是7月15日政變的周年紀念日，也是以一種沉悶---即便有許多人出席---的方式慶祝的。

"說 '不' " 運動導致了全民投票和隨後的抗議活動，雖然一些左翼團體輕視這個活動，他們認為 "我們不能在選舉中擊敗法西斯主義"，但共和人民黨(CHP)參與了這一運動，希望重新計票，因為他們自己的基本群眾迫使他們更積極。當黨的領導與街頭抗議活動疏遠時，年輕一派的部分人呼籲採取 "勇敢的步驟"。他們與自由黨和社會民主左翼的代表一道批評共和人民黨(CHP)的領導，並指責黨對這一可怕的局勢要承擔一些責任。作為回應，前領導人和堅定的民族主義-集權主義政治家丹尼茲·雅克巴薩蘭(Deniz Baykal) 和寇里達羅(Kılıçdaroğlu) 宣佈了該黨的新戰略目標：爭取2019年的總統職位。換言之，只要他們能控制它，他們就不反對新憲法。

除了黨的基層要求採取更強硬的立場反對埃爾多安，大資本也努力加強埃爾多安的對手。當寇里達羅 從安卡拉遊行到伊斯坦布爾時，他得到了土耳其大企業的公開支持。但隨著抗議活動的繼續，許多團體的抵抗空間開始開放。一個真正的群眾運動展開了，而埃爾多安，首先徒勞地解散遊行，結果發現它越來越令人擔心。

共和人民黨 (CHP)和 寇里達羅 試圖將自己展現為與大眾社會運動聯繫在一起的嚴肅挑戰者。然而，由於他們從來沒有想要把這些鬥爭激進化，他們很快就回頭，試圖軟化鬥爭。

左翼對這一新的政治環境採取了兩種主要的方式。[21]

一個派別，傳統上更傾向於共和黨的團體，或多或少接受了共和人民黨 (CHP)作為抵抗的主要支柱，與之並肩工作，未能認識到，共和人民黨 (CHP)仍然是為了控制抗議者的自主潛力。另一陣營乾脆完全解散了這一運動，認為它處在共和人民黨 (CHP)的範圍內，並打算清除該黨的任何影響。

兩者都未能以政治上機智的方式作出回應。左派的任務是推進民主革命，加強反對既定秩序和共和人民黨 (CHP)的社會組織。這需要一個獨立的立場，它也與人民和當地民眾的運動力有關 -- 避開那些只會尾隨資產階級的極端激進的宣言和行動。

還有反對埃爾多安的另一個資產階級支柱：梅拉爾·哈克森 (Meral Akşener) 的上述政黨。去年10月該黨成立後，國際媒體---從‘外交政策’和‘金融時報’到‘時代’---很快就把哈克森 (Meral Akşener) 譽為埃爾多安唯一真正的挑戰者。[22] [23] [24] 哈克森 把自己定為一個女強人，能贏取民族主義者，一些宗教，和經濟自由主義的選民。她強調她反對埃爾多安，支持法治。

但在政治上，她的過去和現在的形象表明，她並不是一個更加公正和民主的土耳其的新面孔。

在二十世紀九十年代，當她短暫地擔任內政部長時，在對庫爾德人的骯髒戰爭中，她與國家中一些最無情的派別結盟。她是一個堅定的民族主

義者，“İYİ”黨的人員也是如此。(“İYİ”是 Kayı 的象徵，Kayı是第十一世紀的突厥部落，在土耳其民族主義傳說中扮演重要角色。)雖然哈克森表示反對總統制，但她也明確表示，她希望在2019年成為總統。

共和人民黨 (CHP)和 哈克森 的新黨分別代表了資本的左-自由主義和右-自由主義之翼。他們可能與 政黨正義與發展黨(AKP) 的部分或與討厭埃爾多安的伊斯蘭陣營合併或結盟。大資本顯然支持這些嘗試。但這些玩家中沒有一個想要加強大眾運動，也沒有意願建立替代埃爾多安和既定制度的民主制。

專制國家的危機

大資本及其代表的計劃是否會取得成果還有待觀察。形勢太不穩定，無法做出預測。

但專制國家陷入了深刻的結構性危機。儘管有十五年的統治，政黨正義與發展黨(AKP) 還是無法按照它想要的方式重組國家。在未遂政變之後，尖銳的霸權危機引起了國家機器之間及其內部的混亂。軍隊內部的團結正在瓦解，來自極右勢力的前 政黨正義與發展黨(AKP) 反對者集居在國內，組成一個不穩定的聯盟，無數的 FETÖ 過程增加了不信任和不確定性。政黨正義與發展黨 (AKP) 的領導力很薄弱。資本關注內部混亂，但更重要的是，關注國際孤立，經濟的可怕狀態，以及關注大約一半的人口不贊同 政黨正義與發展黨(AKP) 統治的這個事實。因此，它試圖繞過土耳其的衝突以及與國際強權的摩擦，希望按自己的利益來解決它們。寇里達羅和哈克森都享有一定水準的群眾支持，並樂於自願成為埃爾多安的替代者。

與此同時，社會鬥爭絕不會消亡。政黨正義與發展黨(AKP) 打算通過緊急狀態壓制的運動並沒

有平息。儘管罷工現在實際上是非法的，但工人們正在贏得爭取改善工作條件和提高工資的戰鬥，正如過去一年中，斯色卡姆（Şişecam）、佩特金（Petkim）和宗古爾達克（Zonguldak）的工人鬥爭所表明的那樣。[25][26] 另一方面，奴力葉·古爾門（Nuriye Gülmen）和瑟米·奧紮克薩（Semih Özakça）的齋戒，代表了政變以後遭解雇的左翼公共部門工作者正在進行的鬥爭的冰山一角。

人民民主黨（HDP）也堅持昂首挺胸。其國會議員和草根活動家遭到大規模逮捕，大大削弱了該黨的組織能力，在全國進行為期兩個月的示威遊行計劃並沒有取得巨大成功。[27]

然而，庫爾德地區的情況看起來不同。在 HDP 據點迪亞巴克爾（Diyarbakır），數以萬計的人仍然參加集會。政府無力擊敗土耳其庫爾德工人黨（PKK），北敘利亞庫爾德工人黨下屬部隊取得的進展，加之政府在敘利亞和伊拉克的無能冒險主義，加在一起，構成了執政集團最大的弱點之一。還有更多的民主抵抗運動，包括強有力的女權運動。幾年前，它反擊了一項計劃中的墮胎禁令，現在的重點是促進婦女的自主性和身體尊嚴，以及制止對婦女的暴力行為。[28]

阿列維（Alevi）社區繼續與宗教歧視作鬥爭，特別是在宗教階級中日益增加的遜尼派勢力。他們一直處於反對前述新課程的鬥爭的前列。對另一種民主的願望，表現在在全民公決前的“說‘不’”委員會中，還表現在針對選舉舞弊的抗議活動中，是格茲公園（Gezi）起義中非常重要的特色。[29]

這些群眾的鬥爭和他們對民主化的要求，應該構成革命左翼的出發點——而不是程式上的改變或總統選舉。這些較廣泛的運動是建立在自下而上的基礎上的，利用基層委員會、論壇和工人團體，

人們可以在那裡發展他們的獨立於從資本和政府的自主權。革命的土耳其左翼必須積極干預這些鬥爭，以便向民主共和國邁進，這種要求，超越了對埃爾多安和總統制度的拒絕，轉而攻擊專制國家傳統本身。

並不是群眾的反動性格或他們的愚蠢，使得他們選擇政黨正義與發展黨（AKP）。主要原因是（依舊是）經濟增長的許諾和對軍事政權的憤慨、涉及接受伊斯蘭的文化自由化以及遭排斥的感覺。甚至內部的政黨正義與發展黨（AKP）研究表明，它的大部分基層不贊成該黨誹謗所有反對派力量為恐怖分子，對黨內的腐敗、偏袒和宗派主義的嚴重程度不滿。

顯然，政黨正義與發展黨（AKP）是自由主義的宣導者和好戰代表，絕不會捍衛工人階級的利益。政黨正義與發展黨（AKP）組織的自由主義越是把國家拉入衝突和危機，黨基礎上的聯盟就變得越發脆弱。

歸根結底，今天的主導行動者與迄今為止彌漫的民主抵抗之間的鬥爭將決定即將出現的共和國的性質、決定其內的工人和受壓迫者的地位，這無關乎左翼分子是否能進一步激化這些鬥爭。

這是一個新的一年。抵抗不能等待到2019。

2018年1月19日

雅各賓派

Footnotes 註腳

[1] <https://www.britannica.com/biography/Ernst-Rohm>

[2] <http://www.hurriyetdailynews.com/turkeys-ruling-party-justice-development-akp-needs-renewal-no-excuses-left-erdogan-says-113716>

- [3] [http://www.hurriyetdailynews.com/opinion/murat-yetkin/the-second-phase-of-政黨正義與發展黨\(AKP\)-rule-and-systemic-change-in-turkey-113375](http://www.hurriyetdailynews.com/opinion/murat-yetkin/the-second-phase-of-政黨正義與發展黨(AKP)-rule-and-systemic-change-in-turkey-113375)
- [4] <https://www.jacobinmag.com/2016/11/turkey-erdogan-coup-hdp-pkk-syria-gulen-ypg>
- [5] [http://www.hurriyetdailynews.com/values-of-turkeys-ruling-政黨正義與發展黨\(AKP\)-rapidly-weakening-former-pm-davutoglu—113981](http://www.hurriyetdailynews.com/values-of-turkeys-ruling-政黨正義與發展黨(AKP)-rapidly-weakening-former-pm-davutoglu—113981)
- [6] <https://www.jacobinmag.com/2016/11/turkey-kurds-erdogan-armenia-genocide-hdp-pkk/>
- [7] <https://www.nytimes.com/2017/10/20/world/europe/us-turkey-visa-suspension.html>
- [8] <https://www.nytimes.com/2017/10/14/world/europe/turkey-new-york-case.html>
- [9] <https://www.jacobinmag.com/2016/03/turkey-erdogan-pkk-kurdish-diyarbakir/>
- [10] <https://thekurdishproject.org/history-and-culture/kurdish-democracy/rojava-democracy/>
- [11] <http://www.hurriyetdailynews.com/opinion/murat-yetkin/after-the-us-russia-also-pressing-turkey-on-the-ypg-116505>
- [12] <http://www.hurriyetdailynews.com/opinion/murat-yetkin/after-the-us-russia-also-pressing-turkey-on-the-ypg-116505>
- [13] <http://www.hurriyetdailynews.com/turkeys-tourism-needs-long-time-to-fully-recover-says-research-firm-117935>
- [14] <http://www.hurriyetdailynews.com/turkey-runs-nearly-7-bln-budget-deficit-in-first-half-of-2017-minister-115613>
- [15] <http://www.hurriyetdailynews.com/opinion/ugur-gurses/high-growth-under-high-interest-rates-117922>
- [16] <https://www.birgun.net/haber-detay/we-make-use-of-state-of-emergency-to-ban-strikes-says-turkey-s-erdogan-169586.html>
- [17] <http://www.hurriyetdailynews.com/turkeys-sabanci-holding-sees-first-half-sales-reach-55-bln-116910>
- [18] <http://www.hurriyetdailynews.com/state-run-ziraat-bank-sees-significant-rise-in-net-profits-amid-strong-loan-growth-116820>
- [19] <http://www.hurriyetdailynews.com/turkeys-koc-holdings-net-profit-sees-sharp-rise-in-second-quarter-116911>
- [20] <https://www.jacobinmag.com/2017/04/turkey-referendum-fraud-protests-dictator>
- [21] <https://www.jacobinmag.com/2015/06/erdogan-turkey-parliament-constitutional-reform/>
- [22] <http://foreignpolicy.com/2017/04/24/can-the-she-wolf-who-rejected-the-harem-take-on-sultan-erdogan-meral-aksener/>
- [23] <https://www.ft.com/content/285ea9e8-4447-11e6-b22f-79eb4891c97d>
- [24] <http://time.com/4856463/turkey-meral-aksener-iron-lady-recep-tayyip-erdogan/>
- [25] <http://www.industrialunion.org/turkish-glassworkers-fight-strike-ban-by-remaining-in-factories>
- [26] <https://news.sol.org.tr/collective-labour-agreement-signed-petkim-172479>
- [27] <https://www.jacobinmag.com/2016/11/statement-turkey-erdogan-repression-hdp-left/>
- [28] [https://www.jacobinmag.com/2017/11/turkey-womens-rights-feminism-erdogan-政黨正義與發展黨\(AKP\)-hdp](https://www.jacobinmag.com/2017/11/turkey-womens-rights-feminism-erdogan-政黨正義與發展黨(AKP)-hdp)
- [29] <https://www.jacobinmag.com/2015/06/kobane-erdogan-turkey-elections/>

拉丁美洲黃金時代的終結？

訪談米利安·朗和厄德伽多·蘭德爾

郭第薛得

2017 年在法國格勒諾布爾（Grenoble）大學就“拉美的進步政府和後-新自由主義：黃金時代的結束？”這個議題，我們舉行了國際座談會，在參加會議之後，弗蘭克·郭第薛得（Frank Gaudichaud）同社會學家愛德格多·蘭德（Edgardo Lander，委內瑞拉）和米利安·郎（Miriam Lang，厄瓜多爾）進行了對話。

在最近一段時間裡，關於拉丁美洲進步全民政府週期的結束，或者關於它們可能的回潮和政治霸權的喪失，有許多辯論。你對這種辯論有什麼看法？在這一點上，我們能否認為這場關於週期結束的辯論已經結束？面臨1999-2015 的進步經驗，我們又能把當前的局面稱為什麼呢？

愛德格多·蘭德：的確，這是一個非常激烈的辯論，特別是在拉丁美洲，因為1998年委內瑞拉雨果·查韋斯獲勝後，人們對這些社會發生深刻變革的可能性，抱有許多期望。這是一個政治變革進程的出發點，這個進程導致大多數南美政府被認為有進步的傾向或左翼的傾向，有幾個版本。由於上個世紀社會主義的負面經驗，以及氣候變化之類的新現實和需要面對的地球限制，這些對變革的期望，給後資本主義社會帶來了嚴峻的挑戰。對今日變革的思考，必然意味著與上個世紀的意義截然不同的東西。當社會主義的話語在世界大部分地區從政治語法中消失時，它又在南美的這個新歷史時刻重現。特別是出現在土著人民的鬥爭中，在其中一些進程中，對第二十二世紀社會主義的基本面的深刻質疑，似乎是以非常中心的方式納入的。它們以一種中心的方式存在，部分是轉變的想像，諸如多重文化性（pluriculturality）、同其他生命網路的其他形式

的關係、自然權利的概念和良好生活的概念等問題，都指出有轉型的可能性，能夠解釋以往進程的局限性，開闢新視野，解決人類和地球問題的新條件。

所以，你說的是最初時期，從2000年初開始，根據在全國選舉和治理層級上冒現出的情況來看，當時來自下層的抵抗與社會政治動力的創造性結合，或多或少是破壞性的和後自由主義的。

愛德格多·蘭德：是的，在這個時期，人們產生了不平常的希望，即社會的根本轉變已經開始。在厄瓜多爾和玻利維亞的情況下，新政府是運動和社會組織的力量在與新自由主義政府鬥爭過程中積累的結果。厄瓜多爾的土著起義和玻利維亞的水源戰爭的經驗，是動盪社會的表現，其中的社會部門——以左翼政治行動的角度看，並不是最典型的——發揮了主導作用。這是一個平民階層的出現，以前默默無聞的社會部門，土著人，農民，城市居民，他們佔據了政治舞臺的中心位置。這產生了不尋常的期望。

然而，隨著時間的推移，出現了嚴重的障礙。儘管有高度的話語權，但在這些鬥爭中起領導作用的左翼重要部門並沒有對二十世紀社會主義的經驗給予足夠的批判性反思。許多舊有的對領導，黨，先鋒隊，國家與社會的關係，經濟發展，與自然其他部分的關係的思維方式，以及單一文化的，以歐洲為中心的世界觀和父權制的偏重，都出現在這些變化的項目中。在國際勞工和自然分工中，歷史上殖民形式的嵌入被加深。顯然，任何旨在克服當今世界資本主義的項目，都必須面對人類今天所經歷的深刻文明危機所構成的

嚴峻挑戰，特別是無休止的現代性增長的霸權邏輯，這個邏輯讓我們面臨超越地球支援能力的地步，破壞了可能使生命繁衍的條件。

所謂進步政府的經驗，是在新自由主義全球化加速的時候出現的，當時中國正成為世界的工廠和主要的經濟體。這在商品的需求和價格上產生了質的飛躍：能源商品、礦產和大豆等農業產品。在這種條件下，每個進步政府都選擇通過深化掠奪性榨取來資助社會轉型。這不僅明顯地意味著這些國家的生產結構沒有受到質疑，而且在國際勞工和自然分工中的新殖民主義形式的嵌入加深了。它還強化了國家作為出口商品收入的主要獲取者的作用。在此情況下，超過憲法文本關於多種民族性(plurinationality)和交互文化性(interculturality)所說的東西，變革的概念占了上風，主要集中於國家和國家共同利益的認同。這不可避免地導致了圍繞領土、土著和農民權利的衝突，導致為防衛和獲得水源和反對巨型採礦的鬥爭。這些國家政府認為，這些人民和領土的鬥爭是對國家項目的威脅，這些項目是由作為全民利益代表的國家設計和指導的。為了執行他們的新發展主義(neo-developmental)專案，儘管有這種阻力，政府還是採取了鎮壓，並有越來越獨裁的傾向。通過從中央確定什麼是優先事項，並把一切同優先事項的對抗看作為威脅，國家的推理邏輯要求破壞已成的抵抗。

就玻利維亞和厄瓜多爾而言，這導致主要社會組織出現某種程度的渙散，以及政府推動的運動分裂，造成了其社會結構支離破碎，削弱了作為其特徵的民主轉化能量。

面對這種分析，特別是關於國家的理由，最後，參與這些政府進程的激進分子和知識份子以及親政府的進步黨派申明，在拉丁美洲建立一個真正的後-新自由主義的道路，是以“康復”國家為首先任務，多虧了社會平民的運動，驅散了黨

的老精英，並在取得反寡頭的壓倒性選舉勝利後，從政府動起（但與下層的人有聯繫），開始佈局和重組替代“真正”新自由主義的可能方式。

米利安·郎：在開始解決這個問題之前，我想再討論一下愛德格多說的話，因為週期的結束，說明應該在阿根廷和巴西的經驗的基礎上，對整個地區做檢視，因為在阿根廷和巴西那裡，右翼實際上回來了。不過，最適當的解讀方法，是看看進步政府期間的改革計劃是如何改變的，為何我們現在又處於10或15年前的情況，以及有些國家，如玻利維亞或厄瓜多爾，進步政府仍然存在。我指的是一些人稱之為變形金剛的變革，以及構成這些政府的政治傾向的多樣性，在那裡，真正的變革左派不再必然是獨大的。但這些進程已成為資本主義關係成功現代化和進入世界市場的項目。

在會議結束時的這一天，你對國際分工，商品，榨取主義(extractivism)，對國家(通常是直到今天仍舊是獨裁的和庇護主義[clientelist]的國家)問題有一個明確的批判立場，順便說一下，這種現象沒有消失，甚至在進步主義(progresismos)的幾個層面上更牢固。但你在這裡沒有提到，在進步政府的黃金十年裡，有“家庭補助金計劃”(Bolsa Família)，貧困甚至不平等現象的大幅度減少，底層社會階層融入政治中，重建了公共衛生的基本服務體系，基礎設施的驚人增長，等等。簡而言之，如果我成為發言人，按照玻利維亞副總統加西亞·利內拉(García Linera)的邏輯，你就會屬於批判性的咖啡廳知識份子，他指責他們沒有真正同情大眾群體和他們的日常生活條件。這至少是進步主義(progresismos)的經典論據，也是當前反對批判左派的爭論。

米利安·郎:這多少取決於我們每個人對現實的觀察。例如,有必要在《玻利瓦爾省憲法》和《厄瓜多爾憲法》中看到,在那裡劃定的改造項目遠遠超出了貧困的減少。從以前的社會鬥爭中積累的一切,都遠遠超出了收入的一點點分配,至少在碳氫化合物價格高企的年代,這可能確實使許多人的日常生活更加容易。但也有一個方面超越了貧困統計。我們可以說,根據貧困線,很多人離開了它,這非常好;但我們也可以更近一些察看並說:我們談論的是什麼樣的貧困?在拉丁美洲,通過收入和消費來衡量貧窮仍然盛行,這是一個事實,它評估家庭參與資本主義生活方式的程度,並很可能不怎麼說及這個家庭的生活品質。它忽視了生存經濟的維度、人際關係品質的維度等等。人們在多大程度上能夠根據自己的環境來表達自己的需求?在一些國家,由於存在著巨大的文化多樣性,許多人仍然沒有完全生活在資本主義的規範中,這些重新分配政策在多大程度上加強了或在領土範圍內擴大了資本主義市場的邏輯?

我們可以說,這種多樣化的生活方式構成了克服資本主義視野的一個重要的變革潛力。甚至如果我們觀察地球的生態條件,而不是貼上貧窮和不發達的標籤,那麼許多農民、土著、黑人或城市民眾社區都可以被看作是如何減少消費和獲得更好滿足的例子。另一方面,所發生的正是我所說的 "不發達的策略";在 "消滅貧窮" 的背景下,他們被告知:這種生活方式需要這麼少的錢是不值得的,你必須像城市的,資本主義的消費人口,你必須管理金錢,交換的形式是資本主義市場,沒有其他有效的交換形式。所謂的金融掃盲,是消除貧困的進步政策的一部分,它幫助金融資本為最貧窮者建立新的信貸市場,其往往是高利率的。消費的顯著內涵最終意味著,我們有負有消費債務的人口,消費產生了需求,而這種需求也許是他們以前沒有的。也就是說,這取決於人們如何看這些問題。這是一個價值觀

和視野的問題,是我們希望子孫後代如何生活的問題。這不僅關乎消費的民主化,而且是建立一個至少在5、6、7代以後可持續世界的承諾,我嚴重懷疑這種消除貧窮的方式是否有助於實現這些目標。

愛德格多·蘭德:在委內瑞拉的情況下,在查韋斯政府的第一個十年中,使用石油租金的方法,與歷史上所使用的方式不同,有巨大的後果。社會支出代表了70% 的國家預算。這種對保健、教育、糧食、住房和社會保障的公共開支,意味著大多數人生活條件的深刻轉變。與拉丁美洲其他國家一樣,委內瑞拉歷來是一個嚴重不平等的國家,它不僅大大降低了貧窮水準(以貨幣收入衡量),而且還設法以引人注目的方式減少了不平等現象。拉美和加勒比經濟委員會(ECLAC)指出,委內瑞拉與烏拉圭一道成為該大陸上兩個不平等程度最低的國家。這是一個非常重要的轉變,其表現在諸如降低嬰兒死亡率和增加兒童體重和身高等重要問題上。沒有次要問題。

另一方面,從政治觀點看,這伴隨著基層組織化進程,參加其中者有千百萬人。為了讓政策起作用,他們需要人民的組織,一些最重要的社會政策就是以這種方式設計的。這方面最好的例子是巴里奧·阿登特羅計劃(Barrio Adentro Mission),在古巴醫生的優先參與下,在全國各地為民眾階層提供一項基本而廣泛的保健服務。這個計劃,代表了按照其他方式的理解公共政策的可能性,按照要求人民參與的非庇護主義(non-clientelist)方式,理解公共政策的可能性。

國家衛生體制改革的重要步驟始於巴里奧·阿登特羅計劃(Barrio Adentro Mission)。我們從完全基於醫院的醫療系統,走向一個分散的系統,在民眾階層中設有基本服務。例如,在卡拉卡斯附近的一個脫水的孩子在半夜必須移動,到最近

的醫院,外面的公共交通要數小時,你從這個情勢,轉向另一個情勢,去基本保健單位,那裡面有醫生居住,距離你家很近,任何時候你都可以敲門,並受到照顧。

巴里奧·阿登特羅計劃 (Barrio Adentro Mission) 被設計成這樣的一個專案,它需要社區的參與來發揮作用。醫生本人,特別地,如果是古巴醫生,他既不知道周圍也不瞭解城市情況,只能在社區的支援下工作。此外,這還涉及對社區的普查、確定孕婦、營養不良問題的兒童、老年人以及有特殊要求的一般人。這構成了社會政策的概念,完全不同於來自上面的禮物,因為它使社區成為其功能的合作者。在這個活動中有一個非常豐富的潛力。

那麼,這個過程的構成及破壞性潛力已經耗盡?這是你的意思嗎?

愛德格多·蘭德: 在玻利瓦爾省進程的幾年中,該國的生產結構不僅沒有改變,而且更依賴石油出口。面向大眾階層的公共政策歷來以其分配性質為特徵,用另外的生產過程替代石油榨取性生產的動機非常有限。這種對高石油收入的依賴,對玻利瓦爾省進程施加了嚴重限制。

由於各種原因,公共政策的民眾組織過程的動態性、激勵性,也在耗盡。首先,因為不是所有的任務 (Missions, 不同社會政策的一般名稱), 像掃盲計劃和社區福利計劃 (Barrio Adentro Mission) 一樣, 有其在某些領域的財富。還有, 因為有組織的大規模組織過程, 直至社區理事會和公社的組成, 是這樣一些進程, 它們總是強烈地傾向自我管理, 或自治, 或者自我組織, 等等, 而且幾乎所有可以由這些組織實行的專案, 都依賴於資源的轉移, 而這些資源來自上層, 來自一些國家機構。這使得在上層政治金融控制和自我

組織的更加自治的可能性之間, 產生了經常性的緊張關係。這些緊張局勢以截然不同的方式運作, 取決於當地的現有條件: 以前的地方領導人在場與否; 在玻利瓦爾省進程之前, 社區組織的政治經驗存在與否; 以及負責政府機關和這些組織之間關係的委內瑞拉團結社會主義黨 (PSUV) 的官員和中堅分子的政治構想。事實是, 對國家資源的轉移有非同尋常的依賴性。大多數民眾草根組織沒有自主權, 因為他們沒有自己的生產能力。

隨著2014年開始的經濟危機, 向這些群眾組織轉移的資源減少了, 這些組織趨於削弱, 它們中的許多陷入了危機。造成這一削弱的另一個因素, 是地方供應和生產委員會 (Local Supply and Production Committees (CLAP)) 的建立, 這個委員會作為一個機制, 把高度補貼的基本食品分配給民眾階層。實際上, 這些已經成為庇護主義的組織模式, 專門用於分配糧食而缺乏自主權, 它往往取代了各社區理事會 (Communal Councils)。

拉丁美洲的團結與合作政策也高度依賴石油收入。執行國際政策, 比如向中美洲和加勒比國家提供補貼的石油運送方案, 向玻利維亞和尼加拉瓜提供財政資助, 以及委內瑞拉政府在拉丁美洲這個地方採取的其他各種舉措, 這一切都有必要保證短期和中期石油收入的增加。當查韋斯於2013年逝世時, 石油占出口總值的96%, 使該國對石油的依賴性比以往任何時候都高。

在委內瑞拉的石油史上, 本世紀的第一個十年, 提供了最佳條件進行辯論、反思和開始試驗其他做法, 反思和試驗不依賴石油的其他可能的委內瑞拉社會的未來。這是一個應對向後石油社會過渡的挑戰的優先時刻。這是查韋斯具有非凡的領導性和合法性的時刻。他有能力為委內瑞拉社會提供方向感, 而且, 由於石油價格達到每桶140

美元，因此有資源來滿足人民的需求，並開始起步向不依賴石油的社會過渡。可發生的情況正好相反。在那些年裡，反復陶醉於富饒，想像著一個沙特式委內瑞拉（Saudi Venezuela），那是二十世紀七十年代第一屆卡洛斯·安德列斯·佩雷斯（Carlos Andrés Pérez）政府的想像。日復一日，委內瑞拉沒有人認為有可能下令關閉所有油井。但即便是膽小謹慎和初步的，用以克服對石油的依賴的措施，政府也遠沒有相應的政策，他們所做的是加深這種依賴性。在外匯過剩的情況下，為了試圖阻止資本外逃，建立了絕對不可持續的受控制平價匯率。這樣，所謂的荷蘭病加劇了，助推解散該國的生產能力。

國家的分配政策和政治動機設法改善人民的生活條件，以廣泛的民間參與經驗，鼓勵加強社會結構。然而，這沒有伴隨著一個項目來改變該國的生產結構。這標誌著作為委內瑞拉社會轉型計劃的玻利瓦爾省進程所具有的局限性。這意味著，以千百萬人參加的基礎廣泛的組織進程，其根基是重新分配，而不是建立新的生產過程。

現在，再看看加西亞·利內拉（García Linera）（因為有時他更聰明地總結了其他意見領袖，追隨者和我所說的宮殿知識份子在這場辯論中試圖說的和寫的）的說法：據他說，短期內的國家和自我組織之間，政府和運動之間，良好生活的維護和榨取主義之間的這種緊張情況，是拉丁美洲革命變革的漫長進程中的正常和創造性的緊張。對他來說，激進左派的對進步進程的批評，是因為不懂那是必要的緊張關係，據說，他們希望通過法令宣告建立社會主義。

米利安·郎：一個問題是，因為進步政府的成員來自具有左派政治標記的社會運動和抗議進程，他們已經擔負了一種先鋒身份。好像他們已經知道人民的需要了。通過這種方式，各種人可以有

效地提意見的真正的對話空間，已經失去了。政治參與已成為執行項目的一種讚譽。這正是其致貧處。歐洲歷史上有很多例子，讓我認為這是不可避免的動向，而我們往往對此低估了很多。最終管理國家機器的左派沉浸在這些機器的強大動力中，通過他們活動的新空間，他們像人們一樣被轉變，因為地位的邏輯為他們提供了其他經驗，也開始塑造他們的政治視野和文化。他們的主體性被改變，他們行使了權力。然後，如果在一個強大的有組織的社會中沒有糾偏行動可以約束他們，可以糾正，抗議，還有批評他們，那麼這必會使項目偏移。

另一方面，對世事變化的時代進行批判，沒有什麼作用，我同意，因為深刻的變革需要大量的時間，他們需要一個文化的改變，甚至要用幾代人。它要檢查一個政治變革專案的方向 --- 即它是否朝著正確的方向發展，以何種速度。在此，我認為日益嚴重的榨取主義（extractivism）的問題，乾脆取消了未來變革的其他可能性。如果通過更短期的算計或者由於目前出現的困難，我們關閉某些對我們很重要的未來選擇，我們就不能說這是一個時間問題；這實是一個方向的問題。你可以市場化或非商品化（de-commodify），但如果你先說我會商業化一切，然後非商品化（de-commodify），我不認為合乎邏輯；如果你說：我在非商品化，但它需要更多的時間，不過，你可以看到，我在按指示的方向採取步驟，這說得通。所以，我認為，對過程的解讀有一個根本的不同。

愛德格多·蘭德：在關於榨取主義（extractivism）的重要辯論中，我認為最基本的問題之一是：我們對榨取主義（extractivism）的理解是什麼？如果我們認為榨取主義（extractivism）只是一種經濟模式，或者正如加西亞·利內拉（García Linera）所說的，是同任何社會模式相容的“與自然的技術關係”，人們可以得出這樣的結論：必須深化榨取主義（extractivism），因為不僅是要回應社

會的需求，也是為了積累必要的資源，投資於替代性的生產活動，使榨取主義（extractivism）得以克服。但是，如果你在更廣泛的範圍內瞭解榨取主義（extractivism），如果你知道榨取主義（extractivism）是人與自然關係的一種形式；是全球資本積累模式的一部分；這是在世界資本主義體系和國際勞動和自然分工中的一種特殊形式的嵌入；如果理解榨取主義（extractivism）產生並再現某些制度性（institutionalities）、國家模型、及其官僚行為模式；如果知道榨取主義（extractivism）產生社會話題和多種主體性；那是建設文化風氣，就必然導致其他結論。

看看委內瑞拉100年的榨取主義吧。我們深深地設置了一個富裕國家的文化，一個富足的國家。由於我們擁有這個地球上最大的石油儲量，我們期望國家不僅滿足我們的所有需求，而且還要滿足我們的消費欲望。我們想像一個有權利但沒有責任的社會是可能的。我們認為石油應該是免費的。這些文化模式一旦堅定地植根於集體的想像之中，對改革的可能性，就構成了一個嚴重的障礙，不僅是克服資本主義的障礙，而且阻礙我們正視人類今天正在經歷的文明危機。這些不斷增加的物質財富的想像，是對經濟主義/消費主義生活觀念的支援，它留下了我們今天必須面對的廣泛的基本問題。這就阻礙了人們認識到，今天正在採取的決定，會產生長期的後果，其意義完全不同於關於委內瑞拉社會未來遠景的官方說法。

根據這個想像中的黃金國，一個無限富足的土地，就有必要認為，例如，在所謂的奧里諾科河採礦弧帶（Orinoco Mining Arc）有大規模礦產開採。通過總統令，尼古拉斯·馬杜羅在2016年初決定向大型跨國採礦公司開放11.2萬平方公里的地方，其面積相當於古巴的領土，是全國領土面積的12%。它是亞馬遜雨林的一部分（在全球氣候系統的調節中具有重要意義）；該地區居住著

不同的土著民族，其領土根據1999年《憲法》劃定，其文化，包括其生活，今天受到嚴重威脅；該地區有這個國家主要河流盆地的優良部分；是水的主要來源；具有非凡的生物多樣性；該地區有水力發電大壩，生產70%的該國消耗的電力。所有這一切，因為開始召喚150家跨國公司，都受到開放的威脅。它被設想為一個經濟特區，在那裡，憲法的基本方面和共和國法律，如土著人民權利和環境和勞工立法都不需要履行。這樣才能創造出可能的最有利條件，吸引外商投資。因此，他們正在作出一些決定，其中概述了可能對未來100年產生影響的國家項目。

根據我的理解，另一個要討論的基本問題是地緣政治問題，在這種情況下，是區域一體化水準的進展，而區域一體化同對帝國主義新戰略的評價的及其對該大陸的干預有關。左派批評者經常說，你輕視和不正確地衡量美國干涉或動盪的影響，主要集中於對進程和政府的內部批評。除其他之外，阿根廷社會學家阿提里奧·博隆（Atilio Borón）肯定的是：他的一些文章堅持的事實是，必須瞭解，不管進步的政府多麼溫和，他們開啟了一波沒有美國參與的一體化新浪潮，在該地區歷史上，這將代表按玻利瓦爾省觀點邁出的巨大一步。那麼，我們對拉美一體化的狀況有何看法，今天，在這一層次的進展和限制是什麼？

米利安·郎：十年前，確實有來自拉丁美洲的全球一級的令人感興趣和充滿希望的建議和動議，這一意義上說，對區域一體化思考的方向，不同於歐洲聯盟的新自由主義憲法，而是特別地按照南方銀行促進主權和可持續性專案的方向，並非經典方式的發展，或蘇克瑞專案（SUCRE project）的方式。不幸的是，在過去10年中，特別是由於巴西的抵制，這些倡議沒有取得成功，巴西顯然在該區域具有重要作用，而且它更傾向金磚四國的其他國家，並優先考慮其作為世界

強國的利益。

愛德格多·蘭德：最後，巴西同意南方銀行的意見，前提是它是另一家開發銀行.....。

如果我們現在看到委內瑞拉嚴重的危機，這一事件已經使知識份子（顯然還有委內瑞拉社會）兩極分化，圍繞兩次國際呼籲，我們目睹了這種兩極分化的轉化。首先是委內瑞拉發出（愛德格多曾積極參與其中）的呼籲，"制止委內瑞拉暴力升級的緊急國際呼籲。超越兩極分化看委內瑞拉"，這份呼籲你簽了名，第二份呼籲，題為"誰指責原告？"的回應，由"保護人性的知識份子和藝術家網路"(REDH)的成員提出，這是一個具相當敵對的反應。[1] REDH 成員的中央論據之一，是申明委內瑞拉的危機首先是帝國主義侵略的產物和新自由主義右派的叛亂，並且是"經濟戰爭"。他們堅稱，在巴西政變之後，我們處於整個區域內右派回歸的局面，這就迫使左翼勢力把面對這一侵略的政府關閉，撇開"次要矛盾"。相反，你們兩人簽署的呼籲說："正如拉丁美洲某些地區的左派所申明的那樣，我們不相信，今天我們正試圖捍衛一個反帝國主義的人民政府。某些活動家和知識份子的這種無條件的支持，不僅揭示了意識形態上的盲目性，而且是有害的，因為它不幸地助長了獨裁政權的鞏固。"

米利安·郎：一位同事最近告訴我，地緣政治觀點把人民的利益和聲音埋沒了。我不知道這是不是次要的矛盾。在我看來，讓這種對抗發生的方式非常可悲，因為它封閉了反思的空間，而不是打開它們。我認為，我們此刻需要的只是一個更深的反思、爭論的空間，而不是關閉這個空間，以便找到解決委內瑞拉危機的辦法。我有一種感覺，人們離委內瑞拉進程越遠，他們就越需要確認一種團結一致的身份，這是有點難以捉摸的反帝國主義的本能反應，是日復一日發生在委內瑞拉的事情。我相信我們需要建立的團結是不同的。

十月評論 2018 第1期

他們不應該圍繞我們自己，圍繞我們的需要打轉，以便像確認一個信仰一樣地確認一個政治身份，而是應該在具體人們之間尋找共同的途徑。應該與實際存在的人民團結在一起，他們往往沒有與政府相同的利益。

這就引出了我的自我批評：最近我回到委內瑞拉，有機會與一些重要的查韋斯主義部門交談，只有在這一刻，我才明白這一領域近年來是如何改變的。在現在的超級分化的場景中，要表現出團結，甚至以一種關鍵的、不同的方式表現它，是多麼複雜。我簽署的那封信在流傳之前，應該已經考慮夠多了，討論夠多了，在簽約前，我自己必須花更多的時間與重要的查韋斯主義的不同部門交談；只是為了讓我自己的方法一致。雖然我仍然認為有必要捍衛民主體制和某些自由主義的價值觀，正如信中所說的那樣，作為過去鬥爭的成果，我們必須擴大和深化它們，同時捍衛它們。最重要的是，我認為外來的侵略永遠無法讓內部犯下的錯誤合理化。

委內瑞拉及其其他國家出現這種兩極分化現象，不允許黑白之間有灰色陰影，這對改革是非常消極的，非常有害的。它使人們很難團結一致，因為不造成這一方的傷害，就會讓另一方受傷害。作為女權主義者，我也認為，這整個辯論的方式是極其父權主義的，充滿了簡單化的二元主義（binarisms），戰爭邏輯和自以為是的自負，而我們應該做的，是建立聯繫和其他方式的政治，即，大家走在一起，尋找替代方案。

事實上，在這次辯論中，似乎已經失去了某種辯證的批判性思維。關於委內瑞拉的兩極分化問題，馬杜羅的無條件支持者強調，一邊是同帝國主義結盟的右翼，一邊是"人民"及玻利瓦爾省政府，兩者之間，兩極化是首要的。這種分析的基礎，顯然是當前衝突各方的具體要素，但它並沒有

留下空間來理解查韋斯主義內部以及民眾內部的緊張、分歧和矛盾。

米利安·郎：在政府和人民之間存在一種人為的聯合，例如，就像在古巴發生的很多事情一樣。換言之，古巴人民是一個，另一個為古巴人民說話的，必然是他們的政府。仿佛古巴社會沒有統治和利益衝突的關係。除了男女之間，但也在政府和社會之間，或黑人，混血兒和白人之間，或國家和城市之間，都這樣。從這個角度來看，把政府和人民統一在一個象徵性的區塊裡，那麼，任何解放都不能真正誕生。最後，如果我對這項任務的理解不錯的話，那麼，我們想要的是減少或克服這些支配關係。在這個兩極化的二分結構中，戰爭的邏輯被重新啟動，這是冷戰遺留下來的文化遺產，它在那一歷史時刻，讓我們可以避免許多必要的教訓。這個遺產，可能部分地被 68 年的起義以其對社會的文化影響克服了，但它現在正在重蹈覆轍，我感到很痛苦。

愛德格多·蘭德：關於委內瑞拉的情況，就我個人而言，我沒有簽署這兩個國際呼籲中的任何一個，因為我真的覺得，在這同時，沒有人回應局勢的緊迫性，對帝國主義侵略，右派和公開支持政變的部門，沒有人回以必要的譴責，同時對馬杜羅主義（*Madurismo*）的獨裁傾向作出明確和批判性的分析，不僅要正式捍衛1999憲法，而且還必要修復人民權力的形式，自主組織的經驗，以及在進程夾縫裡生存下來的社區項目。

愛德格多·蘭德：很明顯，美國一直在進行其帝國攻擊。自從查韋斯政府開始以來，美國政府一直試圖通過地緣政治和經濟理由破壞這一進程。我們知道，委內瑞拉的石油儲量，如黃金、鈮鉭鐵礦、鈾和該國南部其他豐富的礦產儲備，對於美國來說，無論是對自身還是對其全球競爭對手涉入的限制，都是至關重要的。自1999年以來，委內瑞拉代表了該大陸變化的一個切入點，這

十月評論 2018 第1期

就是為什麼美國也支持2002的軍事政變和2002-2003 的商業封鎖石油罷工，使該國癱瘓兩個月，明確顯示要推翻查韋斯總統的政府。我們知道，委內瑞拉極右派的團體和黨派都指望得到政府的長期諮詢和資助。對川普所制定的金融封鎖和武裝干預的明確威脅，絕不能掉以輕心。還有烏里韋主義（*Uribismo*）和哥倫比亞准軍事活動的嚴重干預。這類侵略是委內瑞拉當前危機全景的一部分，左派中沒有人可以避開或把它置於身後。

現在玻利瓦爾省進程的問題是：我們要捍衛什麼？我們該如何捍衛它呢？我們是否必須捍衛政府的任何針對美國的話語權？還是要捍衛一個民主、反資本主義和反帝國主義的集體進程，以此來回應我們所經歷的深刻的文明危機？我們是否必須捍衛日益專制的馬杜羅政府，還是必須捍衛1999年出現的變革潛力？今天，為了維護馬杜羅政府的權力，比起號召民眾參與的呼籲，裙帶關係和切斷獲得補貼的基本物品的威脅起的作用要大得多（處在這樣的條件中，即，對於高比例的人口，這是獲得食物的唯一途徑）。在這裡，在這個背景下，辯論的主題是，今天我們站在左派的立場上能理解到什麼？我們能思考左派而不去質疑上世紀的社會主義是什麼嗎？當試圖克服資產階級民主的力量最終成為獨裁的、專橫的極權政權的時候.....。今天，在委內瑞拉，我們必須自問，我們是否正在朝著深化民主的方向前進，讓人民直接參與為國家目標定方向的門是否在關閉。

在委內瑞拉，1999年舉行了一個制憲議會（CA），其參與程度非常高，組織了一次全民投票，以決定是否舉行一個制憲議會（CA），參預代表選舉的人數很多，結果得到批准，是62% 的多數投票，巨大的資源用於選舉制度的現代化，建立了一個具有多重控制機制的全數位化、透明的系統，還有一個審計系統。一個可靠的選舉制度，已證

明確實是無欺詐的，這一點，為世界各地的許多國際組織和選舉專家所承認。但是，在 2015年12月，反對派贏得了絕大多數的議會選舉，政府面臨著兩難境地，或者尊重這些選舉結果和保持對1999年憲法的忠實，或者相反，盡一切可能繼續掌權，即使這意味著無視大多數人的意願或犧牲已經獲得了如此高合法性的選舉制度。它顯然選擇了不惜一切代價繼續掌權。

正在一步步地作出決定，確定一個獨裁的傾向。中止2016年全民投票的撤銷舉動受到阻礙，同年12月的州長選舉違憲推遲，國民議會的屬性不明，在最高法院和行政權力之間存在濫權情況。截至 2016年2月，總統開始以緊急狀態（“經濟緊急狀態”）的方式進行治理，明確違反1999年憲法規定的條件和時限。根據《憲法》賦予主權人民的權力，馬杜羅召開了全國制憲會議，並界定了選舉機制，以保證對會議的全面控制。選舉產生了一個 清一色的全國制憲會議，其545名成員由政府確認。這個會議一旦開成，就宣佈自己超越憲法和具有絕對權力。它的多數決定是以鼓掌或一致的形式通過的，沒有任何辯論。本來，會議被選的目的是起草新的憲法草案，但會議卻不處理這個任務，而是開始作出涉及公共權力所有領域的決定，解散官員，安排選舉的條件，以防止不支持政府的人參與選舉或難以參加選舉，批准它所謂的憲法法律，這實際上是廢除1999憲法的規定。他們採取追溯性的法律，例如決定取締那些不參加2017年12月市長選舉的政黨。與委內瑞拉團結社會主義黨(PSUV) 領導層選定的人不同的左翼候選人的參與，受到阻礙。同時，全國選舉委員會（National Electoral Council）進行詐騙，阻止安德列·威拉茲庫茲（Andrés Velázquez）作為玻利瓦爾省州州長的選舉……。

這裡至關重大的，不是對1999年憲法的形式上捍衛，而是捍衛民主，不是捍衛一個形式上的資產
十月評論 2018 第1期

階級民主，而是開啟深化1999憲法代表的民主。一個獨特的里程碑，定義了1999年創建的民主憲政秩序的破裂，就像義大利臘腸一樣，民主憲政秩序已逐步被切片，直到我們發現自己不再認得目前的處境。

因此，在這個非常複雜的全景裡，進步主義（progresismo）經歷了粗魯或漸進的挫折，其中關鍵或激進的左派沒有設法作為一個巨大的群眾力量而興起，那裡實際上現存的另一種選舉勢力，目前是右翼新自由主義分子，在這個全景後，在某些情況下，如委內瑞拉，更加動盪，在這進步主義（progresismo）霸權的終端和晚期自由主義的回頭時，如何考慮具體的替代辦法？從良好生活和生態主義的角度來看，從對進步政府的局限和矛盾的批判，從民眾的或非殖民化的女權主義角度來看，如何用具體的視角為我們的美洲去思考烏托邦？

愛德格多·蘭德：在委內瑞拉，我現在唯一樂觀的原因是，危機已經如此之深，並影響了集體意識，其影響的方式造成這種可能性，石油的魅力，尋租主義的魅力和 提供者和獲益者開啟的魔法狀態的魅力，慢慢地在消散。近幾十年來，整個左右兩面的政治辯論都是在石油想像力的參數範圍內運作的，局限在這樣的觀念裡，即委內瑞拉是一個富裕的國家，是地球上最大石油儲量的擁有者。這項政策圍繞著社會各階層向國家提出的，獲取這些資源的要求而運作。我開始看到的跡象，儘管仍然可悲薄弱，但顯示繼續走這條道路是不可能。我們開始假設一個歷史週期即將結束。人們開始抓他們的頭，現在怎麼辦？我同委內瑞拉最持續和最積極的群眾組織，蘿拉社會服務中心合作社（Cecosesola）運動，已經有多年的關係。這是在該國中部和西部幾個州運作的合作網路，它把農業和手工生產者的廣泛網路同城市消費者聯繫在一起，同時還連接了一個大型合作保健中心和一個殯葬合作社。在日常對話中，

諸如種子的調理和交換等主題的出現，使我感到震驚。危機開始前後的對比鮮明。最近，當一個農業社區的人從附近的城鎮下來時，他們告訴他，記得給我帶一罐番茄種子。那是每天的事。這些種子是進口的，選擇的和雜交的番茄，不會繁殖，不一定是轉基因，但第一次播種後就不育。隨著經濟危機的出現，種子的來路被突然切斷。祖傳的農作法正在做調理。農民的會議開始討論問題在哪裡，誰有什麼樣的種子？只有小規模保存下來的本土種子開始被交換，例如馬鈴薯種子，番茄種子等等。這開闢了新的可能性。我們將從這個夢想中醒來（原來這是一場噩夢），並思考我們是否有可能在其他國家，在其他的國度，在其他條件下，生活繼續下去，但現在它正在以一種新的方式進行。

米利安·郎，愛德格多所說的有意思，描述的是非常小的群眾力量的胚芽，但目前，面對巨大的區域挑戰，金融全球化，世界混亂，它可能似乎不是很活躍.....。

米利安·郎：當然，這多少取決於你從哪裡看事情，在此，我認為，例如，在歐洲，我們必須做的，是開始警覺消費者的生活方式在世界其他地區造成的影響。在我看來，它引起的破壞範圍，不僅在環境方面，而且在社會結構方面，在"多元主體性"(subjectivities)方面，比在歐洲所假定的要重要得多，在那裡所有這些都是幾乎看不見的，由愉快和麻醉性的消費者環境偽裝的。

愛德格多·蘭德：或者，相信北方的生活水準不取決於南方的榨取主義。

米利安·郎：我們中的一些人稱這是帝國的生活方式，它自動地假設，全世界的自然資源和廉價或奴役勞動，應服務於世界上20%的最富有者，後者是生活在資本主義中心或其週邊社會的中上

層階級。因而，價格便宜，那就好。它給人的感覺是，地球在生態上和社會方面將崩潰，因為生產了大量的東西，除了"市場"，這些東西卻沒有任何人真正需要，所有的東西，都是因為資本主義人為地製造出來的需要而生產的。因此，在資本主義中心，有一項非常重要的任務，就是減少所花費的物質和能源的數量。例如，在文化轉型的過程中，反增長的運動有一個很好的視角，因為對你前面提到的自由主義的不滿，人們重新發現生活品質的其他非物質層面，以及自己生產的衣服，蜂蜜，或其他東西之類的財富。

是的，在法國也有很多另類的農村網路，有自我管理的集體經歷，有保留地(ZAD)，另類貨幣，等等，但它們仍然很小。

米利安·郎：當然，它們現在是小型網路，但重要的是，要用這些不同的設想感染更多的人，這樣的改變不是由武力造成的，也不是由危機造成的，而是欲望本身造成的。人們可以親身去感覺經驗良好生活的其他方面，可以很容易地彌補物質的缺少，並且不會把減少體驗為損失。

愛德格多·蘭德：不是為了停止擁有東西而犧牲.....。

事實上，在這裡，越來越多的人談論的是，有必要獲取快樂的節制和自願的緊縮，反對消費者浪費，這是一個可以連接到良好生活和生態主義的有趣而有力的概念。

米利安·郎：每次去歐洲，我都覺得很不適應那裡盛行的超速生活方式，我有很多朋友都生病了，如果不是身體上的，就是心理上，如壓力，抑鬱症，過勞，這樣的驚恐打擊。這方面的問題深度被主流話語掩藏得很有系統，繼續將福祉與經濟增長聯繫在一起，而全球南方的感受更是如

此。從拉丁美洲看，在這些中部的國家，一切都必然是一個奇跡。然後，設想這些不適，並使其引生的其他生活形式清楚可見，這將是一個重要的步驟。因為在南方，奇怪的是，每個人都認為生活在城市更好，而在德國或西班牙，情況相反，走向農村的生態社區正在成倍增加。換言之，這一步將有助於打破這種模仿式發展的霸權，那種模式迫使南方重複所有在北方社會犯過的錯誤，例如，用汽車堵塞城市。但在北方，這些錯誤中的一些，正在被新的世代所克服，就像男女分工一樣。現在，從我的世代往下，分擔照料任務的不僅在夫婦中，還在夫婦之外，也許在大廈，在縮小的共存空間所能創造的社區中，這個情形已變得更加常態化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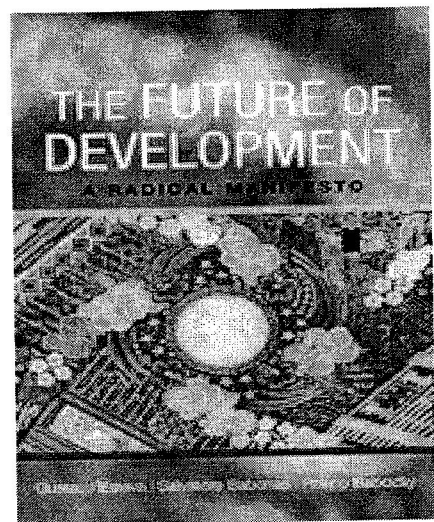
這也是另一個重要因素，即在農村和城市建設公共社區，反對強迫性的個人化。我的意思，這種社區不是通常所理解的祖傳的，不變的小農村，而是運動中的政治社區，把他們的照顧任務整合為集體任務，然後圍繞生活的繁衍而不是市場或資本需求，重組生活。我認為，我們應該讓人們看到在這個意義上做出的所有努力，在這個意義上，無論是在北方還是在南方，人民生活都相對良好。在南部，有部分地區將是祖先的社區，但也有新的，而在北部，這類社區通常是新構成的。這涉及的是，改變單一思維方式的支配情況，查看現存的東西，不必從頭開始發明一切東西。

例如，有一種觀點認為，首先，在全球南部，城市郊區是地獄。但是，如果你更近一些查看，就看到有很多絕對反資本主義的邏輯，不工作邏輯，優先吃喝玩樂，交換而不用金錢邏輯做仲介……。也許這不是模型，反正沒有模型，也不應該有，這是非常重要的強調。在二十世紀的社會主義之後，我們將不會有一個新的獨特的藥方，讓我們都簽署和遵循，應該允許這種多樣性的選擇，以便我們可以根據各個文化和環境，根據參與其

中的人建立各種方案。良好的生活是多種多樣的。

我們還必須創造一種具有各種替代方案的文化，讓我們出錯，犯錯，從錯誤中吸取教訓。這些社會實驗的空間，我們說，好的，我們試一試，如不行，我們在嘗試別的路，但團結一致和不爭不鬥，合作是原則，而不是競爭。一本名叫《發展的未來（*The Future of Development*）》的書表明，在世界人口中，真正嵌入新自由主義全球化市場回路中的人，所占的百分比勉強近一半，其餘的仍在我們稱之為邊緣的地方。[2] 這有希望，它也意味著一半的世界人口處在其他狀況，超出主導模型的範圍，因此我們應該開始注意四周。

非常好，非常感謝。



註腳

[1] ‘革命’（Revoltura）“制止委內瑞拉暴力升級的緊急國際呼籲”和 Venezuelaanalysis.com “誰將指責原告？保衛委內瑞拉聲明”。

[2] 古斯塔沃·厄斯特瓦（Gustavo Esteva），薩爾瓦多·巴邦斯（Salvatore Babones）和菲利浦·巴布斯基（Philipp Babcicky），《發展的未來：一個激進的宣言》，政策出版社，布里斯托爾，2013。

憶王芳（轉載）

劉正清

[編按：2018年6月9日發表于《民主中國》發表時題目改為《憶武漢維權人士王芳》]

我早就有為王芳寫一點東西的必要了。

我為當事人寫文章頗多。有知名度大的，也有知名度小的。王芳屬於後者。因其知名度低，社會關注度相對就小些，她的許多動人事蹟為外界所不知道。每次會見王芳時，看到這位堅強而美麗的女性，我腦裡總有那麼一閃：我一定要為她寫篇文章，讓更多的人知道。

她的事蹟很平凡，說不上驚天動地，但沒有堅強的意志和信念是很難做到的。

根據法理學的理論，法律有預測自己行為後果（即是否違法犯罪）的功能。然而，在這個中國特色的維穩體制下，任何公民只要是上了當局內控的黑名單，誰都沒法根據法律來預判自己何時會被抓？抓後的結局會是怎樣？你吃飯可能被抓，你穿衣可能成為罪犯，……，衣食住行，凡此種種，一切都由當局根據需要而定，假法律之名，行任意侵害人權之實。法律淪為妓院“雞窩”的貞節牌坊。

2015年7月28日一清早王芳在群裡看到耿彩文7月25日與其一起吃飯時，因穿印有“維權抗暴，公益良善”的T恤衫，聲援屠夫吳淦和“709”律師，被抓被抄家的消息後，王芳就去耿彩文家看看情況，由於王芳一直是武漢當局的監控物件，其一進耿彩文家就被早已布控的國保抓走，當天就送到武漢市洪山區桌刀泉派出所作筆錄，當晚送到武漢市拘留所，行政拘留15天（7月28日—8月12日）。8月8日轉為刑事拘留。王芳是因房屋被強拆而上訪維權的，自然早就上了武漢地方當局的維穩黑名單。抓抓放放已成了家常便飯。這次因穿衣服被行拘15日，乃小事一樁，外界根據以往的經驗預判：行拘15日後有可能會放出來，等到行拘轉刑拘後，大家又預估可能刑拘最長期限過了會放人——法律雖淪為中共妓院的貞節牌坊，人們不能根據法律來預測自己的行為後果，但跟中共玩多了，也摸出了一點門道。然而，具體個案，因當局的實際

需求的不同，人們就無法預估了。王芳不過穿了一下衣服而已！這次抓王芳不是目的，目的是要通過王芳抓提供衣服的人。

在行拘期間，當局就反復提醒她“只要把提供文化衫的人說出來，把事情說清楚就可放人。”。然而，王芳不為利誘所動，拒不說文化衫的出處。遂遭報復，行拘期滿即轉刑拘。

當局知道了王芳的堅強、就改變策略企圖用時間來折磨她，在整個刑拘期間沒有提審過她一次。2015年9月15日下午我到武漢市第一看守所擬會見王芳。王芳同名者頗多，單是關在武漢一看的就有三個叫王芳的人。值班民警將三個王芳的年齡告訴我，問我“要會見的是哪個年齡的王芳。”因我之前不認識王芳，就順便說“我不認識王芳，應該是那個60多歲的王芳吧！”。正在值班民警不知讓我見哪個王芳之際。一個便衣（國保）走過來要我將委託書給他看一下，看後，便指著電腦螢幕上顯示的王芳圖像說：“你要見的王芳就是這個40多歲的王芳。”並自我介紹說：“我就是王芳的辦案民警，正在提審她，現在審完了，你馬上就可以會見了。”並帶我到提審室，還要了我的手機號碼。我知道黃鼠狼給雞拜年，不會安好心的，同時就這樣讓我會見也不符合看守所管理的基本操作程式。正常程式是先將在押人員交回看守所，辦理完交接手續之後，看守所再將在押人員提出來讓律師會見。

這種極不正常現象引起了我的警覺。在會見王芳時我要王芳不要說話，有什麼話直接寫到紙上告訴我就行了，並告知其須防竊聽！果不其然，應驗了我的判斷：便衣們的熱情不過是想通過律師會見來竊取辦案線索——從王芳口中聽到提供衣服的人。王芳寫了不到一分鐘，看守所一位民警就來到會見室干涉說：“不能寫，只能說”。會見採取何種方式是我律師的權利，任何人不得干涉。我與之爭辯，毫無意義。權力的蠻橫讓我有一種無力感。心想：能會見到人總比見不到人好些！“兩利取重，兩害取輕”吧——與王芳同案被抓的尹旭安關了近半年了，

仍不讓律師會見，而王芳能讓我見，且國保如此的熱情，他們不就是想通過會見竊聽到偵查線索嗎？該說就說唄，不該說就不說唄！便提醒王芳：會見有竊聽！

如果說前期（逮捕前）當局是想通過王芳之口挖出那個提供衣服者，此招不行後。後期就是如何收場（如何處理王芳）的問題了。可王芳就不給當局的臺階——認罪！

作為一個坐過二次牢的律師，我深知獄中的痛苦。我的原則是：凡是我認為是無罪的案件，我絕不會勸我的當事人認罪，但我也反對在不出賣朋友，不出賣良知的前提下，策略性給當局個臺階“認罪”。武漢的朋友曾讓我帶話給王芳：“考慮到王芳身患絕症，為了能活著出來，妥協下，認個罪，給當局一個臺階。我們外面的朋友都能理解。”我向這些朋友清楚明白地表達了我的上述觀點，並承諾一定會將此話轉告王芳。在會見王芳時，我轉達武漢朋友的建議，並向其表明：“我絕不會勸你認罪，但在不出賣朋友的前提下，你策略性地認個罪，我也不反對，一切由你自己決定。”王芳平靜地說：“要認罪早就認了，還要等到現在；現在認罪也太掉價了吧！只可惜當局沒給我一個‘高、大、上’的‘煽顛’罪。”

案件到了審理階段後，經辦法官為了讓王芳認罪，可謂想盡了一切辦法：先是向王芳承諾只要她認罪，就可馬上判緩刑放人。此招不行，就利用王芳媽不識字又急盼王芳早日出來的心理，給王芳媽做筆錄，將母親思念女兒、盼望早日出來的迫切願望寫在筆錄裡，然後讓她母親簽名；再是利用王芳思念獨生女兒的心理，擬安排其女兒到看守所與王芳見上一面，後因王芳媽的堅決反對，此計劃才未付諸實施。

2016年9月29日上午會見王芳時，王芳告訴我：9月22日武昌區法院經辦法官來提審了，法官問她上次的筆錄（指認罪就可放人）考慮得怎樣？王芳回答很堅定“堅決不認罪！”。後法官就將《人民法院報》報導xxx認罪就判緩刑的消息給王芳看，並對王芳說：“你看xxx與你是同案，他一認罪就出來了。”王芳用雙手蒙著自己的雙眼不看。接著法官又將其母親希望王芳認罪早點出來的筆錄給王芳看，王芳仍是雙手蒙眼不看。出了看守所之後，王芳媽告訴我：法官要她找王芳的女兒，安排其女兒跟王芳在

看守所見一面。

進入二審程式後，二審法官還在做她認罪的思想工作，稱“二審認罪仍可改為緩刑。”，在會見王芳時，王芳將此情況告訴我說：“他們也太小看我王芳了，只有幾個月刑期，還想以‘自願認罪’來損我的名節！”。

有人認為凡訪民都偏激，漫天要價。其實王芳很理性、很平和、很低調；也很體諒朋友們的艱辛，盡可能地節省一些資源。進入法院審理程式後，我告：“我時間很忙，不可能經常來會見你，另外，法庭上可能要進行激烈的抗爭，我一個律師可能頂不住，是否需要增加一名律師？”王芳說：“我們這些搞民運的朋友，資源都有限。為了不增加朋友們的負擔，就不要增加律師了，另外，我要在法庭上不卑不亢，不要以為我們這些人都是無理取鬧的。”

王芳患有絕症——子宮癌，完全符合取保候審的條件。2016年3月1日案件移送武昌區檢察院審查起訴後。我和王芳媽持王芳在武漢大學中南醫院病歷到武昌區檢察院要求取保候審。2016年3月7日我到該院複製案卷材料時，該院向我告知：王芳的癌症是2005年發生，2015年是囊腫手術，癌症沒復發，故不符合取保候審條件。下午到武漢市第一看守所會見王芳，將此答覆，及外面朋友的意見（認罪保命）一併告之。王芳仍不為所動，還是一如既往地堅持自己的理念，不為恐懼和利誘所動；並稱死也不會委曲求全地違心認罪，並要我向關心她的朋友們致謝！

王芳嫉惡如仇，看守所許多違規違法的東西，別人不敢揭露，她卻通過我在網上公開揭露。結果，她卻遭到了關禁閉的報復，我的會見也橫遭刁難。

案件事實我早已清清楚楚了。本無會見的必要了，只是因王芳身患絕症——癌症。為了能多給她點精神慰藉，每到武漢或武漢附近我都要順道去見見她。2016年12月7日乘到長沙辦謝陽案，長沙看守所48小時內安排會見的空隙到武漢會見王芳，一則看看她的身體狀況，天冷了是否要送衣服，二則前天經辦法官突然來電告檢院申請延期審理要補充偵查，此事須告知王芳。

那天下午14:10我是第二個進武漢市第一看守所辦理會見手續的律師。辦理會見手續時，還是如往常一樣，值班員打開電腦一看，就說要

我等等，要請示領導。這樣的事我經歷多了，一點不覺奇怪。這次怪就怪在：兩值班員輪番打了半小時電話請示，竟無領導回復如何處置。後來陸續來了好幾個律師辦會見手續，見此，我說我下午還要趕到長沙，你們要請示領導我阻止不了，但你們要預留會見室給我會見，我是第二個到此的。結果值班員給我預留了2號會見室。後，來了一女警（當初我還以為是所領導）說可以見了。結果該女警帶王芳進會見室就不走了，要監視我們的會見。我對該女警說：“請員警小姐離開會見室，根據《刑訴法》和《律師法》的規定律師會見不得監聽，至於你們要暗中監聽我管不了，但在形式上你們還是要尊守法律的，會見是我的權利也是我的工作，請你出去！”。她說：“這也是我的工作，領導安排的”。我說“領導安排的前提是守法，你的工作前提也是要守法。”

王芳笑著對我說“她是我的管教。”為了不讓王芳再遭事後報復，我就對該女警說“本來這次會見10分鐘就可以了，既然你想聽，那我們就談古論今談到下班，你這樣站著聽到下班吧！”。

這段我與王芳有趣的對話，實為故意說給該女警聽的。後，我曾整理發到網上，引起很大的反響，現重錄之以饗讀者：

就這樣我談北京烤鴨、長沙臭豆腐王芳沒興趣。轉移話題談秦始皇死後不發喪惡臭難聞、秦二世被寵臣趙高所殺的那灘血，妖後慈禧曝屍數日後滿身毛茸茸的赤裸身體，王芳興趣漸增！

進而談偉大領袖歸西後妻死侄囚。我說“江青自縊後舌頭吐出有二寸長”。王芳說“不，是一點五寸長。”。我說“齊奧塞斯庫夫婦各中6彈而亡”。王芳說“不，是6、4而亡，夫6、妻4”。我說周永康在‘茉莉花’時殺氣騰騰的講話。王芳說周永康受審時的蒼蒼白髮，怪可憐。我贊王立軍在重慶打黑的英武。王芳哀王立軍在薄熙來開庭時座在輪椅上狀如一條死狗。我講我村一文革期間任革委會主任因執行偉大領袖指示，文革結束後被判10年，出獄後遁入空門信佛，還以死相挾阻其子女入官場。王芳聽後開懷大笑說“活該！活該！是報應啊！不是不報，只是時候未到！”。

我們談興正濃，聰明的王芳知我要趕長沙就催我結束。

臨別時，我無心跟王芳告別了，只是和藹地對守候數小時的女警說“謝謝員警小姐的聆聽！”該女警回敬我的是一個燦爛的笑容，沒言語。莫非該女警下次還想聽我們的故事！

這是我平生最愉快的一次會見，在返長沙的高鐵上我什麼也不想，只是沉浸在這次愉快會見的喜悅中。

於2016年12月7日長沙

無情未必真豪傑，人身肉長，誰都有割捨不了的親情。王芳已有二年多沒見其獨生女兒了，她是多麼的想見她呀！然而，她又怕見到女兒後，控制不住自己的情緒，會流淚。被當局拍攝到做醜化宣傳。為此，她忍痛要我告訴女兒開庭那天千萬不要到法庭旁聽。

在法庭上，控方多次提到王芳的訪民身份，說王芳的行為不是追求自由、民主，是為了自己的利益瞎胡鬧。這其實與是否犯罪沒關係，無非是矮化王芳而已！王芳不卑不亢，坦然地在法庭上說：“我承認我之前是為了自己的利益而上訪，但在上訪的過程中，我看到了太多的黑暗和各級官員的醜惡，從而使我走上了追求自由、民主、法制這條道上。你放心，你的矮化，我不在乎！我要為了我自己也就不用在這裡開庭了，這就是明證！”沒有誇張的動作和矯情的語言，一切聽上去是那麼的自然和真切！！

今年的6月11日是王芳出獄的最後期限，離她出獄不到10天時間了，趕在她出獄之前作此文，作為一束鮮花獻予這位堅強不屈的巾幗英雄！

2018年6月1日

悼念熊安東老戰士

十月評論社同人

2018年2月26日，熊安東老戰士非常不幸地病逝，終年96歲。

安東在年青時，原本是在山東省立濟南第一中學就讀的。

但後來被日軍戰火所逼，隨學校逐步向西遷，直至重慶，長途跋涉，非常辛苦。他在年青時閱讀了許多馬恩列托的書，接受了托洛茨基思想。他寫出了許多好文章，《十月評論》轉載的就有：《戰爭年代成長的青年群體》(本刊總221期)，《憶劉平梅》(222期)，《國立第六中學第四分校》(230期)·《孟浪少年時——我的中學時代》(233期)、《驀然回首大學時光》(231期)、《抗日救亡——遷校入川》(234期)，《重慶托派組織略記》，《王振華，黎潔霜夫婦》(235期)、《祭陳道同》(239期)和《胡謫敘懷》(240期)等。

去年底，當他得到通知，《彭述之回憶錄》兩卷集已等他或夫人去取時，他夫人雖說可單獨去取回，但他雖然有病，卻擔心該書中途有失，因而仍要自己去取。取到後略為一看，已經非常高興，彭述之是他所敬佩的前一輩，所寫的歷史又是他所要熟知的，

因而雖然有病在身，也顧不得許多了。這也可見他的求知慾之大！

他的一生經歷，為了信仰馬克思托洛茨基主義，追求實現，卻飽受壓迫折磨，幸而在折磨痛苦中，他能從許多社會主義·馬克思主義書籍裡得到啟發與安慰。從《熊安東口述生命史——段躍訪問記》中，可以具體而詳細地瞭解熊安東的一生事蹟、思想及為人。為供給讀友有關資料，本刊特轉載於後。

熊安東可能還有些未發表的遺作，我們以後如果得到，當予以轉載。

30/05/2018



熊安東口述生命史

段躍

熊安東是中國托派中的小人物，按他自己的話說，“我不過是個群眾演員，是個跑龍套的”。儘管1949年初，他在托派多數派當了幾個月的江浙黨團臨委委員，但那不過是托派中央離上海後的一個臨時應變機構。在以職務為量刑標準的上世紀50年初，熊安東被劃進中央領導人的杠杠裡，判處無期徒刑。那年，他31歲。

我第一次聽到熊安東這個名字是在重慶採訪曹惠白老人的時候，曹惠白是熊安東在中央大學時的同學，她在口述大學經歷時，經常會提到這個名字，並重覆著一事：那時熊安東不斷地拉她，給她看托洛茨基的著作，介紹她認識托派領導人鄧超麟和彭述之。如果不是熊安東，她就會被另外一些同學拉進中共地下黨裡去了，她的一生也不會被托派這頂帽子弄得如此不堪。不久，我從熊安東的另一位同學曹先志那裡得知，熊安東還活著，就在上海，曹先志答應幫我找到他，並說服他接受我的採訪。2004年，我接到了熊安東的回信，表示同意採訪，2005年6月，我來到上海熊安東的住宅，一座上世紀70年代末的居民樓裡。口述從6月6日開始，每天進行三個小時，共9天，近30個小時。

熊安東的經歷並不複雜，1922年出生，山東惠民人，出身於一個中等規模的地主家庭。他的父親一生辦教育，民國時在山東擔任過多所中學、鄉村師範學校的校長，按他的評語，父親崇尚蔡元培式的自由主義教育理念。他的母親是一位善良的農村婦女，是舊式包辦婚姻的犧牲者。在他9歲那年，追求自由的父親與母親離婚，與另一位同樣抗拒包辦婚姻、追求自由的女性結婚。熊安東說：“這件事對我的性格和我的

人生選擇產生了重要影響。”這一年起，熊安東隨父離開鄉村到濟南讀高小、初中。1938年抗日戰爭後，他隨校南遷，就讀於國立第六中學四分校，此間接受馬克思主義學說，確立共產主義理想，並參加托派外圍組織——真理讀書會。1943年高中畢業後前往重慶，一邊在工人中宣傳革命，一邊準備高考，1945年考入中央大學歷史系。讀書，參加進步學生運動，主持南京的托派工作是他大學生活的主要內容。1949年1月他擔任托派多數派江浙黨團臨委委員。1949年3月在上海正始中學就業，擔任地理教員。上海解放後，協助新政權下的教育局完成正始中學的撤併工作。後調入上海奉化中學，任地理教員，同時負責這所學校從私立到公立的改造工作。1952年12月22日被捕。1955年根據《懲治反革命條例》第四款，被中國人民解放軍上海市軍區委員會軍法處判無期徒刑，剝奪終身政治權利。後轉入上海提籃橋監獄服刑。1972年9月被“寬大釋放”，轉入上海青浦縣青東農場管制和改造。1979年6月5日“給予公民權”。1979年8月定居上海。1987年，經人介紹與上海紡織印染廠一位女工結婚，時年66歲。我採訪熊安東老人那年，他已83歲，今年應該是90歲。

我做了一個統計，熊安東在31歲以前幾乎沒有離開過學校；被捕後，他的生活又限制在監獄和勞改農場，回歸社會已近60歲，人生的黃金時代過去了。他與普通人相比，能夠自主的人生很短暫，參與社會的經歷也很單純。他的行動力和思考力都沒有越出學校和監獄的大門，他所做的最長久的事情就是讀書和思考。由此我想到一個詞：思考者。用今天的標準衡量，思考者算

甚麼？他有理論建樹嗎？他著作等身嗎？都沒有。他一事無成。那麼，熊安東終其一生的思考有用嗎？有意義嗎？他的人生有價值嗎？答案是：我需要換一個角度，放棄“成者王侯敗者賊”的思路，另辟蹊徑。當我進入到自然的人生史、自然的思想史這條思路重新審視這份口述文本時，我找到了意義：熊安東通過思考完成人性中最富有意義的特質，他盡了一個人對歷史的一份力量。清點他一生思考的過程，就如同讀到了一本書——一本歷史的書，一本思想的書，一本生活的書。

就此，我為這份採訪手記確定出一條敘述主線，即遵循熊安東的思想軌跡，追索他思想的自然史。

為什麼選擇了托洛茨基主義？

在我向熊安東提出這個問題時，腦子裡存在一個背景：熊安東是在中學讀書時加入托派的，他所讀的國立六中四分校，位於四川羅江，抗戰時由山東省幾所流亡南遷的中學合併而成，其“左傾”、“赤化”是出名的，以致1942年，被國民政府教育部明令撤併。在那個左翼思潮滙集的偏僻小鎮裡，左翼作家、共產黨員、托洛茨基主義者都想方設法把學生拉入自己的陣營。

據熊安東回憶：“‘托派’是中共的叫法，我們不叫‘托派’，叫中國共產主義同盟，這是第四國際的名稱。”從名稱可以看出，當年熊安東傾向托派是和共產主義連在一起的。就當時的國體而言，共產黨和共產主義同盟都屬於在野黨，其與執政黨國民黨的關係都可歸入持不同政見者，或反對黨派。在反對統治者和信仰馬克思主義這個層面上，托派和中共是一致的。那麼熊安東是怎樣在共產主義這個平台上對“托”與“共”做出區別的呢？

起初，我的分析是：熊安東選擇托派可能

帶有學生受老師啟發的盲目性。因為國立六中四分校有一位公民課教員，名閻子桂，他信奉托洛茨基主義，口才出眾，對學生的影響力強大，至抗日戰爭勝利時，這所中學相繼有50多人參加了托派的真理讀書會。

仔細斟酌，我否定了這個分析，因為著名左翼作家李廣田、方敬、陳敬鶴等也在這所學校教書，屬中共陣營，比閻子桂勢力更強大，對學生的影響力亦強大，而熊安東與他們的師生關係比閻子桂更密切。按理說，熊安東更有條件追隨中共，為什麼李廣田們沒有把他拉到自己的陣營呢？

多次交流後，我將口述記錄做了梳理，發現有兩件事直接影響了熊安東的選擇：

一是讀書。對此，熊安東有過詳細的回憶：

“那是國共合作時期，作為中學生，我可以自由進出新華書店，可以公開在書店裡買到《共產黨宣言》，普列漢諾夫的《社會科學基礎》、《唯物史觀》，王明的《為布爾什維克化而奮鬥》等。一九三九年底我認真地讀了《共產黨宣言》、《國家與革命》等馬列的著作，為的是弄明白共產主義是怎麼回事。讀後，我明白了資本主義剝削的非正義性，資本制度把人異化成了為資本增殖利潤的動物。在戰爭的年代，我很輕易地就接受了他們的學說，相信只有經過社會主義革命，實現社會主義社會才能根除戰爭。到了社會主義社會就沒有了剝削，沒有了壓迫，人人自由平等，每個人都獲得全面發展。”

“一九四零年初的一天，共產黨同學劉守身到我住的寢室，送來了《聯共(布)黨史簡明教程》，他說：‘這本書很重要，很全面，它發展了馬克思主義，讀了這本書，才能懂得什麼是列寧主義。’他說：‘馬列的著作，我不用看，就相信是正確的，在蘇聯不是都實現了嗎？托派們讀馬克思列寧的書，他們懂個屁！他們只會反馬列、反蘇反共、他們就想在蘇聯復辟資本

主義。這本書一定要好好的讀一讀。”等成德茂、李芸生幾個人讀過之後，我讀了劉守身介紹的《聯共（布）黨史簡明教程》，又讀了他拿來的一本康生寫的小冊子《鏟除日寇偵探民族公敵的托洛茨基匪徒》。我不相信閻老師和托派同學會是匪徒，我不明白共產黨人為什麼把陳獨秀說成是漢奸。我很想知道托洛茨基派是怎麼回事。

一九四零年暑假前，我在羅江縣民眾教育館的圖書館無意發現了《托洛茨基自傳》，我借了出來，傾向中共的兩個同學知道了，責備我，‘怎麼看這種書，不要看！’我說，‘不看怎麼知道他的不對呢’，我講的也是實在話。”

“同學杜文林知道了我正在讀《托洛茨基自傳》就主動把托洛茨基的其他著作介紹給我，我早就知道他是“真理讀書會”的會員。他性格內向，待人態度和善誠懇。一九三九年上半年，他一個人辦了一份壁報，貼在校外街頭的牆上，向民眾宣傳抗日救亡。他勤奮認真，星期日，他一個人自寫自編自畫，忙一個上午，一星期出一期，堅持了很長時期，令我佩服。

一九四零年暑假前後的兩個多月裡，我又讀了托洛茨基的《兒子、朋友、戰士》、《中國革命問題》、《不斷革命論》、《十月的教訓》、《蘇聯現狀與前途》、《在新的世界大戰之前》等幾本書。杜文林還給我看了抄在練習簿上的幾篇文章：《德蘇協定的前因後果》、《蘇芬戰爭》、《從資本主義到社會主義之路》等，都是閻子桂老師的筆跡。

就這樣，我知道了一個過去不知道也不理解的托洛茨基。與《聯共（布）黨史簡明教程》裡講的正相反，托洛茨基認為斯大林叛離了俄國十月革命的傳統，敗壞了列寧的蘇維埃民主制，背叛了共產國際的國際主義使命，使第三國際名存實亡，對於俄國的十月革命後的蘇聯蛻變出斯大林官僚獨裁制，托洛茨基的分析批判是

很有說服力的。由此，我瞭解了他是為了捍衛馬克思列寧界定的社會主義世界革命而反對斯大林特權體制。斯大林體制打著社會主義的旗號敗壞社會主義信譽，而有會導致資本主義在蘇聯復辟的危險。

讀托洛茨基的同時，我還讀了法國著名作家紀德寫的《從蘇聯歸來》和《從蘇聯歸來答客問》兩本小冊子。紀德明確地告訴人們，他所看到的斯大林的蘇聯並沒有實現列寧的社會主義，舊世界的特權正在蘇聯披著社會主義外衣還魂。因之，紀德遭受到法共和親蘇人士的陰險譏諷。我相信紀德是正直的人，他對蘇聯社會實況的考察和描述，實證了托洛茨基對蘇聯現狀的分析和判斷。

“從此，我信仰馬克思列寧，也信仰了托洛茨基”。

另一件，是發生於1941年的皖南事變。

熊安東回憶道：‘1941年皖南事變，在學生中影響很大，有人就說：“共產黨和國民黨蔣介石合作，合作個屁！把你新四軍都打掉了！”’這個說法，我也在另外一些托派那裡聽到過。我推想：皖南事變，可能是一些青年從中共陣營跑到托派陣營的標志性事件，就如同1927年大革命失敗後，一部份中共黨員痛定思痛，在托洛茨基主義的感召下拉起反對派之旗，自立門戶一樣。革命的慘痛教訓引起了革命者的反思，也加劇了其內部的分化。在托派的思路中，皖南事變與大革命失敗被看成繼發性連鎖事件，其重要教訓是，共產黨與蔣介石的無原則合作：中共對蘇共的無原則服從。這一點，剛好印證了陳獨秀和托洛茨基對中國革命的論斷，於是，托洛茨基的思想最終說服了熊安東。

由此，我獲得了一個答案：在相同的歷史背景下，熊安東的選擇是他獨立思考的結果。正如他自己所說：“在國立六中，我始終不是積極分子，跟著共產黨走我不是積極分子，跟著托派走

我也不是積極分子。我是自己一步一步穩穩地走的，我沒有投機取巧”。

需要說明的是，本文所使用的“獨立思考”一詞，不意味著“自由選擇”，也就是說，經過“獨立思考”的結果，不等於“自由選擇”的結果。在那個民族矛盾激烈衝突、外族入侵戰火紛飛的歷史條件下，個人自由選擇人生道路的可能性是很小的。熊安東的獨立思考只能在他選擇革命方向上得以體現，而革命，則是一個時代的情緒，一個時代的選擇。熊安東說：“我記得我被捕以後，我和承辦人員談過，我說過去的路不是我自由選擇的，不可能自由選擇。這並不是我把責任推向客觀，好像生活就是那麼走的，在那時代里，有這個認識我就要走這條路”。

為甚麼對農民戰爭發生興趣？

1943年，高中畢業的熊安東決定到重慶參加工人運動，他之所以做出這個決定，一方面是對托洛茨基主義的信仰，工人運動是無產階級革命的主要力量，他願為此獻身；另一方面，在他之前已經有數批畢業生奔赴重慶做工，以馬克思主義思想組織和發動工人，期間重慶的托派組織兩次被破獲，一些成員被捕入獄。他說，那時有一種前仆後繼、熱血沸騰的感覺。

在重慶工作了一年多，他深感理論與現實之間巨大的差距，認為有必要進行更深入的學習和思考，在回憶考大學的思想過程時，他說：

“當時我們的想法還是立足於長期投入中國革命的，如果我們光在工廠裏搞工人運動，範圍太小；另外我們也不能這樣全到工廠裏，又總是被國民黨一下弄掉，畢竟我們在社會上還沒有擴大影響。那些比我先到重慶來的左傾同學也是這樣考慮，所以他們都鼓勵我們，有能力考大學的就去考大學，不要留在工廠。”1945年熊安東考取了中央大學歷史系。

我問他：為甚麼選擇歷史系？回答：“主要想研究中國農民戰爭。對這個課題，我在中學時就發生興趣了。所以，進大學後，別的心思沒有了，主要精力都放在學習上，到圖書館搜集有關農民戰爭的資料”。

以下是熊安東對農民戰爭問題思考過程的敘述：

因為之前我已經讀了很多馬列的書，所以我主要是用唯物史觀來理解和考察中國的農民戰爭。

恩格斯講馬克思發現了唯物史觀以後寫了三篇文章，《拿破侖第三政變記》、《法蘭西內戰》、《法蘭西的階級鬥爭》。恩格斯講这三篇文章是唯物歷史觀的理論框架，但他不說這是經典著作，只說馬克思是用唯物史觀來解釋法國大革命這個歷史問題的，說它是唯物史觀的經典著作是後人講的。我想，既然這樣，我要看看馬克思在文章裏邊是怎麼寫的。看完後，我發現，馬克思並沒有明確地講，他這幾本書使用了唯物史觀的立場、觀點、方法。他就像寫歷史一樣，我看不出來唯物史觀的理論框架究竟是怎樣的。怎麼辦呢？我拿出以前小學讀《論語》的精神，再看一遍。還是不明白，我想這個辦法不行。就把法國的歷史書拿來讀、把法國大革命的書借來讀，想從其它著作中尋找馬克思的特點。關於法國大革命的書有很多，中大圖書館裏有的，我都借出來了。這樣一看，看出道理來了，每一本書的講法都不一樣，回頭過來再看馬克思的，作一下對比，才曉得馬克思處理問題、看問題的角度有甚麼不同。從1945年下半年一直到1946年的上半年，大學一年級我讀了很多法國大革命、法國歷史的書，我的主要目的是研究中國問題。

我慢慢形成一個觀點：毛澤東從大革命失敗後，將革命的重點轉到農村裏去，一直到1949年勝利，這20年，他甚麼新鮮事情都沒干成，還

是在農民戰爭的圈子裏，那時候別人不是這種觀點。我形成這種觀點有一個原因，1944年郭沫若寫了一篇文章《甲申三百年祭》，是寫明末李自成的。毛澤東也曾經拿這本書說事，有的人說這本書好像是對共產黨的忠告，告誡共產黨不要重走李自成的路。我當時覺得，郭沫若的想法正相反，他是對蔣介石的一個警告，因為蔣介石當時的做法已經跟秦始皇差不多了。當然，不能排除他也希望中國共產黨不要再走李自成的路；這說明他是把延安的毛澤東看成一個農民領袖的。從這個角度，我受到了郭沫若的啟發。

我們1946年6月復員到南京，大概有半年，下半年開學以後我還到圖書館裏去研究，這段時間我涉獵最多的是太平天國，太平天國的書很多，我記得有羅爾剛的，還有誰的，我都借來了，一些原始資料，包括《太平天國日記》這類站在曾國藩的立場上罵太平天國的書，我都看了，正面的、反面的。經過大量搜集和閱讀，還有中國古代的歷史，我形成了一種想法：農民戰爭、外族入侵，就會出現改朝換代。中國歷史上的革命，離不開這三種關係——農民戰爭、外族入侵、改朝換代。從秦漢歷史以來，中國一直都在這個怪圈裏。

我本想沿着這個因果關係深入下去，準備大學畢業論文就寫這個東西，我向系主任賀昌群講了這個想法。我說，我想研究太平天國。他說，為甚麼？我說，我對中國歷史上的農民戰爭很有興趣。他說，蠻好。他說，應該系統地讀，最好在二十四史裏找資料。可惜後來不行了，學生運動一波一波的高潮，我沒有辦法繼續，研究就中斷了。

現在我想，毛澤東從1927年到1949年，是20年；從江西曲曲折折，到1948年一路膨脹起來，奪取政權。現在人看20年是漫長的，歷史上看20年，不算甚麼。歷史上那些農民戰爭都是經過幾十年的時間發展起來的，不是說起來，就起來的。

李自成、張獻忠搞了幾十年，太平天國是最近的，從廣西到南京，到失敗，也是二三十年，這樣比起來，毛澤東這20年同樣有一個發育過程。那時候的我思想還沒有這樣系統。這個發育過程怎麼來的？根據歷史唯物論的觀點，地主的剝削是一個原因。

為甚麼主持南京的托派工作？

1947年到1949年，熊安東在南京地區主持托派工作，與之前接受托洛茨基主義時偏重讀書和思想不同，他在這兩年，開始將思考付諸行動，投入革命活動，其個人行為與托派組發生了更為直接的關係。為敘述方便，我將熊安東的這段經歷清理出三個問題：

一、是誰派熊安東主持南京的托派工作？

與熊安東交談經常會出現一個困難：當問到，誰派你去某處？上級有沒有指示？有沒有程序或儀式？等問題時，老人總會露出無所適從的表情，說，“這樣的問題我從來沒有想過，沒有注意過……”在一封信件中，他直截了當地寫道：“你不要把托派想象得像中共那樣有嚴格的組織程序，嚴密的組織紀律。”

的確，托派組織在抗戰勝利後處於恢復階段，組織結構和形式非常鬆散，沒有等級，沒有嚴格的任命、免職等程序；我所見過的人事文件中，有開除某人的通告，還有中央委員、分管委員、地區幹事會等名單，並無其他；我所了解的溫州、廣東、廣西、重慶、武漢、香港、上海、南京等地區的托派組織多是各自開展活動，與中央的關係不密切；還有一些人，完全各自為政，與地方組織也沒有聯繫。可考的組織關係有三：一是當地召開幹事會時，中央會派一個人過去，講一講當前的形勢和任務；二是核心領導人需要避難時，地方負責安排、掩護；三是組織青年

成員參加彭述之在上海辦的講習班，學習馬恩列托的經典著作。中央沒有為各地區委派負責人的權力，我所了解的廣東、廣西、溫州、重慶、武漢、香港、南京的托派負責人都是自行擔當，後選舉產生的。南京的地區托派，原本沒有組織，只有幾位有托洛茨基主義傾向的人零散地單幹，熊安東考入南京大學後，曾以重慶代表的身份到上海拜訪托派領導人鄭超麟和彭述之，順理成章地在南京與上海之間充當聯絡員。熊安東回憶：“剛到南京的時候我腦子裏並不想真正展開工作。我的精力還放在農民戰爭問題上了。到1947年上半年，抗暴鬥爭以後，我才下決心，應該影響他們。真正把我弄到這裏，促使我為托派工作的，就是抗暴鬥爭。”也可以說熊安東決定在南京發展成員、開展活動是他自己的決定，並非組織委派。只是當他的工作有了一定的進展後，得到彭述之、鄭超麟和王凡西的認可，自然地形成了一種中央與地方的組織關係，而實際上，這個時候，托派中央已經分裂成兩派了。

我曾經問他：“可不可以說，托派有一個特質，其核心不是組織，而是思想？”回答：“對。我們是注重思想的，其核心就是托洛茨基主義，就是創造社會主義思想。基本上就是讀馬恩列托的書，傳播他們的思想，這一點是區別於共產黨的。”

二、熊安東做了那些工作？

簡列如下：(1) 發展組織成員，兩年中，他共恢復和發展組織成員22人，遍及中央大學、金陵大學、金陵女子大學、南京中小學教育系統、國防部、後勤部系統等，學生為主，工人和職員佔少數。發展成員的工作方式是組織讀書會。(2) 鼓勵成員和外圍青年參與各種進步的學生運動，包括壁報、社團和遊行集會，發散傳單等，目標是反對國民黨政府的腐敗，推翻其統治，比如反饑餓，反內戰等。他發展的成員曹先志、曹慧白、

楊同春均因在進步學生運動中表現激進被捕入獄。(3) 在工人中開展活動，建立工人夜校，組織大學生為工人掃盲、宣講馬克思主義，發動工人組織起來罷工，反對剝削等。

三、為甚麼參加多數派建黨？

正當熊安東按照自己的信念開展工作的時候，中國托派內部發生了一件大事：分裂。

抗日戰爭勝利後，慘遭破壞的中國托派組織正在恢復中，很快因政見分歧和個人恩怨出現分裂。形成鄭超麟、王凡西為首的少數派和以彭述之、劉家良為首的多數派：1948和1949年初，兩派分別成立自己的黨——中國革命共產黨和中國國際共產主義聯盟。這給原本信心十足的熊安東出了一道難題：一方面多數派、少數派分別派人來南京，試圖說服他加入自己的陣營；另一方面剛剛發展的成員，該歸屬到多數派？還是少數派？熊安東在認真閱讀分析了兩派各自的政治見解後，找到了一種處理方法，稱之為“門戶開放”。意思是開放自己，取中立，促進再次統一：開放成員，將兩派見解擺在桌面上，由本人自行選擇，無論選擇誰，回到南京，還是一家人。熊安東回憶：我對自己的這個做法還是很有信心的。

1948年8月，熊安東參加了多數派的建黨，他回憶道：“我從反對兩派分裂出發的，我希望通過建黨使兩派聯合起來。”“到1948年上半年，兩邊為了統一還是你吵我，我吵你。我想，人家共產黨那邊在打國民黨呢，你們卻在這邊打派仗。吵到1948年8月，少數派無論如何拒絕，不參加，不同意統一。這時候淮海戰役打起來了，形勢已經明朗。我說，不管怎麼樣，先把黨建起來，我是在這個情況下參加了多數派建黨”。之後，他仍然與少數派領導人鄭超麟有聯繫，“鄭超麟也抱有幻想，希望把我拉過來。”

對中共勝利的思考

1949年，與中共的勝利相比，托派是失敗者，這是事實，也是當年很多篤信托洛茨基主義的青年人的心結，對此熊安東毫不諱言。

1946年開始，熊安東幾乎參加了中央大學的所有進步學生運動，這些學生運動多數起於自發，通過中共地下黨的推波助瀾，運動不斷升級，規模和聲勢也不斷擴大，中共在學生中的影響力日益強大。熊安東並沒有因此而放棄自己的信念，改換門庭。我問，為什麼？他回答：當時“在我看來，共產黨是機會主義。他們支持學生當然是好的，但是這種支持是機會主義的。”“運動我是參加了，反蔣鬥爭是沒問題的，所以我聽同學很高興地跟我講時，心想是共產黨在利用學生的情緒。我當時想，你要支持，反而使我們的運動（托洛茨基式的社會主義運動）困難。這種事情已經時過境遷，1947年、48年三大戰役勝利了，我還是有那麼一個想法。我講這些，是恢復歷史原貌。”

1947年4月10日中共在平山縣西柏坡村發佈了《中國土地法大綱》。熊安東認為，這土改是為了放手發動群眾，“你不拿東西，怎麼放手發動群眾呀？”熊安東對這種做法是有所質疑的，“你會不會徹底？是不是又是機會主義？”他的基本態度是懷疑和觀望。

1948年8月托派多數派召開建黨大會，提出以在中國建設非斯大林式的社會主義為目標，這個目標曾讓年輕的熊安東激動萬分，他回憶：“當時，我對中國有了一個爭取社會主義的黨，充滿喜悅和希望。但我知道，這個黨能不能成為一個真正的無產階級政黨，還有待歷史考驗。”

1949年3月，大學畢業的熊安東在上海的私立學校正始中學任教。5月初，一個國民黨軍部駐進正始中學的四層教學樓，指揮虹橋一綫的作戰。“我們把學生遷移到另一座三層的實驗

室大樓繼續上課。校園裏有一個很大的場院，有足球場、籃球場、排球場。軍部一佔用，就在場院裏挖戰壕，布防虹橋戰鬥，整天汽車來來往往運武器，大樓裏都是炮彈、機械。”“我記得5月25號晚上，我從宿舍的窗子看到，國民黨的汽車向外跑，唏哩嘩拉的，逃跑的樣子。

一覺醒來，早晨了，起來一看，院子裏都是渾身泥裏巴唧的解放軍。解放軍進來了，國民黨跑了。因為睡着了，不曉得解放軍什麼時候進來的。後來知道，那天解放軍首先從虹橋一綫發起進攻，半夜裏國民黨的軍隊就潰退下來了。

“國民黨失敗了，共產黨勝利了，我在正始中學教職員宿舍的窗口，看到了這一嬗變的歷史瞬間。”

“我作為一個中國人，看到貪腐不堪的國民黨失敗，感到由衷的高興；想到1947年5月20日，他們在南京珠江路上殘酷地鎮壓學生，看到他們落得如此狼狽下場，滿心稱快。”

“解放軍要在7月7日舉行進城儀式，上海總工會號召並組織上海人民編成四路縱隊與解放軍並肩遊行。不料，那天有颱風在上海附近登陸，開始風特大，刮得人站不穩，繼之是瓢潑大雨，把市民隊伍衝擊得潰不成軍，四散躲雨，解放軍四路縱隊依然齊齊整整地在大雨中行進。那天，我穿着一雙訂做的新皮鞋，在雨水裏泡得不成樣子。

我作為一名中國托派成員，帶着成見觀察共產黨的勝利，卻產生不出勝利者的喜悅激情，有一種失落感。”

1952年被捕後，在接受第一次審訊時，他再次感到勝利者與失敗者不同的心境：“他們在問到我對自己的評價時，我說，在主觀上我是革命的。承辦人帶着警告的口氣說：‘現在我是理解你們的，將來我們的年輕人是不會理解你們的，也不會諒解你們的’。他每說到‘不會’的時候，話音都很重，有一種要征服人的信心的感

覺。”

熊安東在審定口述本文時，加入了這樣一段文字：“半個世紀過去了，不知多少黃浦江水流入東海，歷史老人在中國托派的考卷上批了一個零分！”

經過27年的改造，你改造好了嗎？

有一個問題我一直好奇：經過27年的監禁和改造，熊安東青年時代的思考是否被改造了呢？1972年，當他接到一紙釋放書，上有“已改造好”的字句時，他的內心深處，真的認為自己被改造好了嗎？

熊安東如此回答：我曾說“我思想沒有改造好。這是唱戲的話，老實講，沒改造好包括了改造好，不是說絕對沒改造。”

第一件事，“在我解放以後，對共產黨有些地方，已經把老托派的偏見甩掉了，否定了。比如，不承認共產黨力量的存在，他不可能勝利等。為什麼會甩掉呢？因為我對中共的認識已經轉到這是一個農民戰爭上來了。”

第二件事，“1965年元旦，我得到一套《毛澤東選集》，第四卷的內容我還是第一次看到。讀後我想，毛澤東這些戰爭思想就是托洛茨基的，是托洛茨基對於中國抗戰的那些觀點。毛澤東在反托洛茨基的同時，不會想到，他對付蔣介石的兩手，既要支持，又要反對，正是托洛茨基的。而當時的中國托派，並沒有響應托洛茨基，搞了‘失敗主義’，‘保衛主義’。我從這裏看到，毛澤東領導中國改革勝利是必然的。”

第三件事：原來我理解的統一戰綫是王明那個東西，1941年“皖南事變”，我發牢騷，我把王明的統一戰綫理解為共產黨的統一戰綫了。看到毛澤東的第四卷以後，我發現他這個統一戰綫和王明的不一樣，他是又統一，又獨立，這一點和托洛茨基的主張是一樣的。托洛茨基沒

講“統一戰綫”這個詞，只是和國民黨的合作有一定的條件，要保持自己的政治獨立。後來我知道，毛的獨立是因為斯大林對他不信任。

熊安東認為，“思想改造本來就是一個很唯心的提法”。他說，在監獄裏讓我們“看舊報紙，學習兩論，思想沒通，更加認為托派思想的正確。但表面還要說假話，保持一致。”“很快我就意識到，如此這般的思想改造，就是把人改造得會自覺說假話。”這大概是熊安東在上世紀70年代的覺悟。距我採訪他的時候已經過去三十多年，歷史上的假話正在被一句一句地清理着，甄別着，熊安東終於可以按照原貌敘述他沒有被改造過來的，未變的托派立場。

例一， 社會主義定義的認識：

“學生時代，我看了《從蘇聯歸來》那本書，改變了，發現了社會主義還有這樣的黑暗面，接受了蘇聯並不是社會主義的觀點，蘇聯的社會主義是七搭八搭湊起來的。”

“實際上毛澤東也沒有走上社會主義，但是他在主觀上，是想走上社會主義”。“我承認了毛澤東的這個社會主義，後來我把它歸結為空想社會主義”。但我不接受毛澤東對社會主義的定義，因為毛澤東的這個社會主義是有階級和階級鬥爭的。在寫《新民主主義論》的時候毛對社會主義的理解還是馬恩的社會主義，他是根據馬克思列寧的社會主義的觀點寫的。但這個時候的歷史情況既不是社會主義又不是資本主義，才搞出一個新民主主義，在新民主主義社會裏當然有階級。也就是說新民主主義相對於社會主義來說還是一個過渡。1957年以後，毛澤東向左擺了，他否定了那個對新民主主義的解釋。他現在就要建設社會主義了，可是現實中有階級存在，所以他後來又說社會主義有一個相當長的歷史階段，在這個社會裏有階級和階級鬥爭。

這個和我所理解的就不同了。我還是按照馬克思的《哥達綱領批判》，列寧的《國家與革命》來理解的。我認為社會主義應該是沒有階級，沒有階級鬥爭。在這點上我並沒有接受毛澤東的觀點，所以我說我的思想沒有改造好。

例二，對斯大林的看法：

我曾經問過熊安東一個問題：你對斯大林有刻骨仇恨嗎？這個問題實際上是我的一個主觀臆測：如果說當年中共對立面是國民黨和以蔣介石為首的國民政府，那麼托派的對立面還多了一個斯大林，在他們的認知中，斯大林不僅背叛了列寧和馬克思主義，而且是迫害托洛茨基的兇手，是蘇聯實行大清洗的罪魁禍首……因此，我猜測熊安東對斯大林的看法一定會非常情緒化，所以設計了這個情緒化的問題。他的回答出乎意料：

我對斯大林的刻骨仇恨沒有，確實沒有，為啥沒用呢？因為首先我在接受托洛茨基時，也是片面的，我覺得托洛茨基和斯大林的鬥爭不是純粹的個人鬥爭。斯大林對托洛茨基有刻骨仇恨，所以最後把他刺死了。但是托洛茨基，他的著作可以看出他的精神，他更主要是把斯大林作為一個歷史問題，研究斯大林這個人是怎樣產生出來的，他的社會階級，他沒說過斯大林和他個人之間的恩怨，他只是寫了斯大林的評傳：但是反過來，斯大林倒是可能帶着這種情緒，所以從托洛茨基的著作裏面，我不會產生對斯大林的刻骨仇恨。再說，我沒有接受托洛茨基觀點的時候，我對斯大林很崇拜。轉過來說，那個時候是斯大林主義，也不會產生這種刻骨仇恨，跟毛澤東的階級鬥爭不是一回事。

1937年斯大林對托派的結論：“是一伙無原則和無思想的暗殺者、破壞者，殺人兇手的匪幫，受外國偵探機關僱傭而活動的工人階級死敵的匪幫。”當然他也完全相信中國共產黨根

據斯大林的結論，給中國托派作出的結論：“完全是帝國主義和國民黨的反人民的卑污工具。”其實我沒有把共產黨看成和國民黨一樣的反動政府。

例三，對大躍進的看法：

有一點，我至今仍堅信，如果停留在土改後的“平均地權”“耕者有其田”的階段，中國億萬農民是無法解脫貧困，避免歷史悲劇重演的。所以我的總的態度，在當時還是擁護共產黨指導億萬農民走合作化道路，走人民公社道路的，並且為之叫好。事實證明，20年的農業社會主義改造，是一場平均主義的農業空想社會主義試驗，付出的代價巨大而慘痛。

對於大躍進，我當時很懷疑。我的懷疑是有根據的，托洛茨基在三十年代對斯大林搞農業集體化的批評，對我是有影響的。托洛茨基認為這是斯大林的“瘋狂奔馳”，是“危險的冒險”。所以我想“大躍進”會不會也是“瘋狂奔馳”？

例四，學習《九評》

1963年監獄裏組織托派們學習《九評》。熊安東回憶：這次學習，“想當然地引起我們托派犯人的關注，且受到震撼”：

一九五七年組織我們托派犯人參觀，當時的情況是“一邊倒”向蘇聯，蘇聯是社會主義國家，對我國革命和建設都進行了無私的國際主義援助，幫助我國新建、擴建、改建一百五十六項大型工礦企業，幫助設計、供應頭等裝備，派專家幫助安裝，幫助建設大型水庫，建造萬里長江上第一座大橋，還有低息或無息貸款等等。可在一九六三年中共中央給蘇聯的公開信裏，又公開指出：蘇聯對中國的援助不是單方面的，更不是無償的，是通過貿易方式進行的，從蘇聯進口的東西，比國際市場價格貴得多。蘇聯對中

國的貸款，主要是從蘇聯購進軍事物資，大部份消耗於抗美援朝戰爭中，為這些貸款償付本息，佔對蘇聯出口的相當份額，抗美援朝中，蘇聯向中國提供的軍事物資，也不是無償的……這簡直是天翻地覆的一百八十度大轉彎。一九五七年的形象教育被一九六四年形象教育沖得無影無蹤。

我們小組的學習發言都很謹慎，誰都怕一言不合《九評》旨意招來禍殃。大家不約而同地找到一項“擁赫迷修”的帽子往自己頭上戴，不論學習那一《評》，都要結合這一《評》的內容，對準戴在自己頭上的帽子，狠批一通，就叫做聯繫思想了。所謂“擁赫迷修”的涵義是擁護赫魯曉夫揭露斯大林的黑暗，盲信赫魯曉夫回歸列寧原則。但我們心裏都清楚：《九評》實際是替斯大林批判做“秘密報告”的赫魯曉夫，把斯大林大國沙文主義冒充國際主義做的壞事，找赫魯曉夫出氣。托洛茨基所批判的斯大林修正主義，同《九評》批判赫魯曉夫修正主義其實是兩碼事。我的內心依然堅持着托洛茨基的觀點：斯大林統治的蘇聯不是社會主義而是一個過渡性質的社會，他有可能前進到社會主義，也有可能延長官僚特權集團的統治，導致資本主義復辟。蘇聯是個“墮落的工人國家”。

在上海的托派犯人中，只鄭超麟一人學習《九評》後寫了八、九萬字的心得體會上交政府，題目《幹部主義論》。後來政府幹部宣布說，鄭超麟寫的東西是放毒，警告鄭超麟不准在小組裏擴散。

1979年6月，托派們離開農場、結束管制的時候，鄭超麟給政府寫了一份二十幾年的思想總結。他講，“二十年的關押，七年的管制，我覺得自己還沒有改造好自己的思想”。熊安東說：“這和我當時的想法是一樣的。”

監獄內外看“反右”

在口述涉及到1957年“反右”時，熊安東做了一個區分，監獄內監獄外。我在口述整理時為此加上了小標題：“鐵窗裏看‘反右’”。以下回憶記述了他對“反右”的思考過程：

1950年，趙丹演了一個電影叫《武訓傳》，在上海很轟動，教育局長就請我們中學的老師分批到電影院去看，接受教育，叫我們學習武訓精神。我也去看了，看回來，在一個座談會上我講：武訓在山東不值錢，他是山東人，山東稱為武二沫子，這個是我在小學時老師講的，就是說他表面上叫義學，到最後是穿了個皇馬褂，所以在山東對這個武二沫子不怎麼看好。沫，就是唾沫的沫。當時我的概念是，共產黨來了，把武訓背出來，就說明共產黨也是這麼一個……我把武訓同共產黨聯繫起來，因為共產黨是從農村出來的。當時我覺得共產黨對武訓這麼轟動，正說明了共產黨的性質。另外，影片充滿了改良主義思想，並不是推翻滿清王朝，而是另外一種東西。大概當時我是這麼個想法，我就講了。座談會本來是要大家同聲說好的，我來了個武二沫子。雖然沒說壞話，還是有點懷疑的。沒想到大概隔了一個星期，毛澤東的社論出來了，“《武訓傳》必須批判”。我一看，我真高興呀，因為這個批判比我想得還明白。

到1957年大鳴大放，我們看到報紙，那時候我覺得越來越不像話，我印象最深的是，我看到周恩來跑到杭州，他說，我是來放火的，我是來推城牆的。他這句話表示黨群關係要理解，因為當時的黨群關係對立，他來放火，大家來燒城牆，就是要把黨群關係之間的隔離燒掉。我一看，周恩來是對共產黨提意見了，所以那時候我看到章伯鈞、羅隆基……這些人的意見報紙上都有了，還有儲安平。我覺得，對這些言論就是要整。

我那時候想，共產黨這麼弄，你又和民主黨派搞統一戰線，好了，他們把你吃掉了。我不是站在共產黨的角度，我還是站在托派的角度，你看，事實證明要被他們吃掉，因為本來就是說共產黨是小資政黨，擺來擺去，他這樣做的話，走不到社會主義，反而被這些資產階級思想所吞掉。我當時還以為真要天下大亂呢，我倒不是為共產黨擔心，而是覺得共產黨不應該允許這樣搞，這樣怎麼行呢，還有什麼社會主義？沒了！

那時候產生一種牢騷：我主張社會主義，你把我弄到這裡來坐著，可是你們又弄的是啥東西！當我看到《文匯報》對這些言論要批判了，要反擊了，和《武訓傳》一樣，我又拍起手來，好！好！

1957年下半年，組織我們出去參觀。我聽到農業社給我們做報告：他們右派說我們高級社是高草社，胡說八道，光長草，不長糧食，請你們看我們的田地裡怎麼樣，我還相信他們的話，以為真是右派造謠。

後來講到陽謀陰謀的問題。我當時還覺得毛澤東講的蠻痛快。我說，毛澤東這個人講話倒是爽氣，講實話。

我問熊安東，走出封閉的監獄，到了開放的80年代，當你知道反右的真實情況以後，還這麼看嗎？他回答：

右派產生的背景是整個的社會。因為毛澤東轉了，原來毛澤東是新民主主義，右派的幾個主要人物對新民主主義是贊同的，但毛澤東卻把新民主主義斷了，城市裡邊搞社會主義改造，農村裡邊搞高級社，第二年就到了人民公社，走到另一個方向上了。那些代表資產階級思想的人，過去擁護共產黨，並不是擁護社會主義，他們想進行一場民主革命，這個是事實。共產黨裡邊也有一些人要進行民主革命，對於社會主義革命沒有充分準備，毛澤東把過去的共同綱領

推掉了，不要了。所以，右派的產生是一種資產階級思想反對社會主義實踐，而毛澤東的社會主義也並不是無產階級的社會主義，問題就出在這個地方。

在當時那個時代並不是哪個人想出來的，也不能說毛澤東引蛇出洞，那時候是個特殊情況的鬥爭，確實存在著一些人想走資本主義道路的問題。這個不僅是毛澤東，八大定的路線就是個資本主義路線，就是新民主主義路線，毛澤東像開車一樣，開著，開著，向他說的社會主義開了，把這些人從車上甩出去了。

我認為毛的空想社會主義，產生這個結果是必然的，蘇聯十月革命也產生這種東西。至於說把反右擴大化，打擊面這麼廣，是錯誤的。不過，現在又一邊倒了，把反右鬥爭全部反掉。

托洛茨基的“不斷革命”和毛澤東的“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是一回事嗎？

當我把這個問題提給熊安東時，他立即做出回答：不是。好像他對此早有深思熟慮，的確，他在文化大革命時就開始思考了。

1966年文化大革命，開始的時候我並不特別注意，當然我們的政治嗅覺還是蠻靈的，通過看報紙有所察覺，到66年底、67年初把劉少奇打倒了，我當時覺得怎麼把國家主席給幹掉了？那時候我還是接受報紙上的宣傳，認為劉少奇在社會主義改造的時候還在搞什麼新民主主義，批他新民主主義我覺得對，我本來對新民主主義就是有看法的。

開始不叫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叫社會主義文化革命，我想這回中國要真進行社會主義革命了，徹底了，以前那些公私合營、社會主義改造，只能叫改造。我的思想跟著外邊的宣傳跑，完全是從字面上來理解的，外邊的實際感受一點都沒有。後來又搬出個“無產階級專政下的繼續革命”，這時我才發現這個革命和托洛茨

基的不斷革命不一樣，和馬克思講的也不一樣。

出獄後，他有機會閱讀到更多的思想資源和社會資訊，他繼續思考：

我們出來以後是十一屆三中全會，對毛澤東的評價有了。我對自己1949年形成的“這是一個農民戰爭”的看法，更加清楚了。就是說毛澤東搞的20年，是空想社會主義的大膽試驗，按這個思路，再看以後的變化，我認為1949就是一個農民的勝利，毛澤東扮演了一個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的角色，也扮演了一個無產階級社會主義革命的角色，他同時扮演了兩個角色。這就可以解釋，毛澤東後來為什麼會棄掉新民主主義，搞社會主義，一直搞到文化大革命。

文革中，我也存在著一個疑問：無產階級專政下的繼續革命是不是馬克思的不斷革命？當時我看過《紅旗》雜誌上有闡述這個理論的文章，我記得最清楚的是張春橋的一篇東西，張春橋把馬克思關於不斷革命的文字都引進來，有兩頁之多。他以此證明無產階級專政下的革命就是馬克思的不斷革命。我不是這樣看法，我覺得從馬克思不斷革命到托洛茨基的不斷革命，包含一個連無產階級專政本身都要消失的過程。無產階級專政是一個政權的形式，毛澤東在人民民主專政的時候，還說國家消失，政權消失，他還按照列寧那個國家革命的觀點，後來搞無產階級專政下的繼續革命，你繼續革命就是不斷的革命，怎麼不斷的革命上邊還有一個無產階級專政？好了，這就證明，這個不是馬克思的或者托洛茨基的那個不斷革命。

另外一個是關於毛澤東的那個講法，馬克思主義的什麼東西，千條萬條，就是一條，造反有理。馬克思主義要是那麼簡單就好了，什麼都不要學了，有“造反有理”這一條就是了。我想，這不是把馬克思科學社會主義的思想理論全部給弄掉啦？當然，在那個時候，這個想法我不敢

說。對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我當時沒覺得這是把社會主義革命進行到底，這個社會主義我沒有深刻的去認識，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後批毛澤東，我才想起，應該是空想社會主義，當初我還沒把它說成是空想社會主義。

現在很清楚了，所謂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既不是無產階級，也不是文化，也不是革命，不能按他這個胡來。

托派為什麼沒有發生信仰危機？

記得上世紀90年代的報刊中，有一個說法：當蘇聯東歐劇變到來時，托派們的心情似乎比共產黨員們更加平靜，因為托洛茨基對此早有預言，或者說，按照托洛茨基的理論，這是一個必然結果：

1989年底，東歐巨變，震盪最大的是羅馬尼亞，羅馬尼亞領導人被殺。我們當時覺得，這不是悲喜劇，是悲醜劇，又悲又醜的那麼一個劇。

當時第四國際有一個理論家叫曼德爾，他的著作在中國幾乎都翻譯了，書上介紹他是第四國際的理論家，這個評價是比較高的。西方人對他的評價是：這是繼馬克思之後一個了不起的人物。當時他對蘇聯東歐的變化有個說法：這個不是社會主義的失敗，是斯大林主義的失敗。當時把蘇聯的變化看作是馬克思主義的社會主義失敗了，共產主義破產了，西方資產階級都這樣認為。曼德爾講，這不是共產主義的破產，也不是社會主義的破產，這是斯大林主義的破產。這種觀點我們是接受的。所以那時候我記得一般社會上的人流行信仰危機，懷疑列寧，懷疑社會主義，而我們這些原來有托派思想的人，倒是穩定的，沒發生信仰危機。

就是說，你們依然認為，馬克思主義對資本主義的分析，對現代社會階級關係的分析是正確的？熊安東回答：“是的，我現在老覺得有資

本主義存在的話，這些世界矛盾沒法解決，將來還要走向一個更大的人類災難。資本主義還在發展，它還沒有完成歷史任務，但是無論如何，從各方面講，資本主義不會長期存在，它的矛盾沒法解決，特別是全球化之後，這個矛盾更無法解決。”我又問：那麼社會主義革命也是必然的？他說：“是的，但革命不是製造出來的。”

就我個人的理解，托派們對信念的堅守，還有一個原因，他們的探索著重於思想的發展而不是政權的鞏固；他們不是勝利者，沒有奪取政權的喜悅，他們的思考不是建立在勝利者的神話之上。其探索的動力、反思的動力遠遠大於當代主流人群——從勝利者上升為統治者。

根據第三國際的一個謊言？

因為堅守信仰耽擱人生的大好時光，在今天，被看成“傻”。這使我想當然地以為：托派們一定對自己的人生深感後悔。與我的想像相反，熊安東老人回答：“我不後悔。”

現在我不客氣的說，你們對托洛茨基的基本思想，並沒讀過，你們受的教育是傳統斯大林那個反面的東西。所以作家曾彥修在一篇雜文中講：“我很奇怪，像陳獨秀這樣聰明的人，他怎麼會接受錯得不能再錯的托洛茨基的觀點？”這句話裡就可以看出，曾彥修並沒有看過托洛茨基的東西。多數人是把中共對托派的定義和斯大林反托的東西當作托洛茨基的。斯大林把托洛茨基漫畫化，你們是在哈哈鏡裡看到托洛茨基的。

1991年，毛選第二版出版，把第一版的注解劃掉了，我一看，第一卷161頁的注解三十沒了，分別在第二版的第一卷裡，在三個地方把這個問題重新講，最主要的是講，黨過去把托派說成是漢奸、托匪，都是根據第三國際的一個謊言。我們看到這段話，有點哭笑不得，你是根據謊言，

我們是27年！看了這個要哭，哭不出來；要笑，笑不出來。27年，一晃，就那麼結束了，就是根據一個謊言？！

我那時候的想法是，還好，我還留著一條命，還能看到這個變化。我能看到這個變化還算一件幸運的事情。

這段口述曾令我沉思良久，因為我所知道的活下來的中國托派，大都存活到90歲以上高齡，儘管他們長期生活在社會的底層，但直到去世前，他們都保持了思想的清明，是什麼東西支撐著他們的生命和思想？也許不是因為托洛茨基主義代表著真理或真理的全部；他們也不是在等待托洛茨基主義升格到真理的壟斷地位。理由也許很簡單：為了那個謊言——

他們要終其一生戳破謊言，他們要為自己的存在而堅持，為存在的正當性和正義性而堅持。

寫到此處，我不禁要問：因為一個謊言，葬送幾百號人正常的人生，誰更需要後悔？乃至懺悔？

需要說明的是，這份口述從採訪到整理歷時6年，採訪的時間比較集中，整理的過程斷斷續續，期間熊安東先生不顧年邁多病，本著實事求是、還原真相的態度做了許多的求證和補充，提供了很多線索。口述錄音經張笑顏女士錄入文字後，又經過熊安東先生修改兩次，終成此稿。我在修改稿的基礎上做了5萬多字的注釋，以求提供口述者所處歷史環境的豐富信息，從而接近還原口述者生命和思想的成長變化過程。在我工作的過程中，重慶的曹惠白、湖南的曹先志老人給予我充分的信任並向我提供很多信息；上海的周履鏘、葉春華、曹思驄老人也為我提供了真誠的幫助，在此一併感謝。

段躍謹識

2012年7月30日

We Must End One-Party Dictatorship to Achieve Democratic China !

Zhang Kai

In March 2018, Tam Yiu-chung, a newly-appointed member of China's National People's Congress Standing Committee, said that candidates may be barred from running for seats in Hong Kong's Legislative Council if they call for an end to China's "one-party dictatorship", implying a violation of China's Constitution. Tam denied he was speaking on behalf of central government officials. He claimed that he spoke his own opinion.

Afterwards, Chen Sixi, a vice-director of the Central People's Government Liaison Office in Macau, who is also expected to be appointed as the director of the Macau Basic Law Committee, echoed Tam's viewpoint. Chen claimed that "the Constitution is the fundamental law of the country and is applied in the whole country. Although Hong Kong is a Special Administrative Region, residents must respect the Constitution and defend the authority of the Constitution – this is the same in Hong Kong, there is no difference in the two systems."

On 25 April, Wang Guangya, the former Director of the Hong Kong and Macau Affairs Office suggested that people who asked to "end one-party dictatorship" should not be qualified to stand for Legislative Council (LEGCO) elections. Such a slogan not only violates the Constitution, and it is also an illegal behavior.

In fact, it is exactly the existing ruling group that violates the constitution. They have implemented the one-party bureaucratic dictatorship which completely controls party, state, and the military, and deprives people of democratic rights based on the Constitution. Other parties within the so-called coalition government become rubber stamps who cannot supervise and intervene.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CPC) rejected socialism and planned economy and changed to embrace capitalist market economy which led to all levels of bureaucracy becoming corrupted.

CPC has implemented one-party bureaucratic dictatorship which made so many mistakes and brought disasters to the country and the people. Why does it not end immediately? Why can't it change to a government elected by the people of the whole country?

People have sharp eyes. They have already proposed it during the Democratic Movement of 1989 and June-Fourth Massacre. According to its five operational goals, Hong Kong Alliance in Support of Patriotic Democratic Movements of China (HK Alliance) calls to end one-party dictatorship and build a democratic China. All Chinese, including people of Hong Kong, Macau, and Taiwan, should enjoy democratic rights, including freedom of speech, criticisms, and full suffrage (political franchise and candidate eligibility). Any member of LEGCO who proposes to end one-party dictatorship should not be disqualified. The proposal should be voted for adaptation by the majority of LEGCO members. Any vote of disqualification of LEGCO member should also be passed with the two-thirds of those present. This cannot be decided by people like Chen Sixi and Wang Guangya.

The leadership of HK Alliance will not surrender to Wang and his allies. On 4 June 2018, in a candlelight vigil, the HK Alliance continues to call "to end one-party dictatorship and build a democratic China", in memory of those democratic warriors, as always. We believe every year, everybody actively attends the candlelight vigil for June Fourth Democratic Movement, in response to Wang and his allies by action.

28 May 2018

Hong Kong:

- 3 The Candlelight Vigil for the 29th Anniversary of June-Fourth Massacre.....Zhen Yan
- 4 Program, Obituary, and Declaration of the June 4 2018 Candlelight Vigil (reprint).....Hong Kong Alliance in Support of Patriotic Democratic Movements of China
- 6 How Can We Ignore the Continuation of the Bloody June-Fourth Massacre?Long Hair
- 8 To Oppose to Oppression and Heavy Penalty on the Youth Rebels.....Jun Xing
- 9 To Defend Freedom of the Press and Personal Security of Journalists.....Juan Di

China

- 10 We Must End One-Party Dictatorship to Achieve Democratic China.....Zhang Kai
- 11 China's Comprador Fomenting Financial Panic.....Po Mi
- 12 Xi Jinping's Regional Plan of Xiongan and Free Trade Harbor of Hainan...Lau Shan Ching

International

- 17 A Motion to Reform Salaries of CEOs of Wells Fargo Bank.....Zhao Jing
- 18 Erdoğan and His Opponents.....Guney Işıkara, Alp Kayserilioğlu, and Max Zirngast
- 27 The End of a Golden Age? Interview with Miriam Lang and Edgardo Lander.....Franck Gaudichaud

Memory

- 38 In Memory of Wang Fang (reprint).....Liu Zhengqing
- 41 Commemorating Xiong Andong, the Old Warrior.....October Review
- 42 Xiong Andong's Oral History.. (Reprint)Duan Yue

Article in English

- 55 We Must End One-Party Dictatorship to Achieve Democratic China.....Zhang Kai